

英灵不朽

浩气长存



李浩成，男，遇难时20岁，天津市武清县人，生前为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汉文学专业87届本科生。

89学运期间，李随该校五千余名师生前往北京声援。据目击者提供的情况，6.4日晨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时，李正在广场东南角拍摄现场照片，遭戒严部队射击连中两弹，致命一弹位于肝部。送同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6.7日医院根据学生证号通知了天津师大，校方及死者亲属认领尸体后就地于八宝山火化。校方给予了李亲属两千人民币作为补偿，同时销毁了李的学生档案。



戴金平，男，遇难时27岁，湖北省人，生前为84年湖北农业大学毕业，86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读硕士研究生。
6.3晚11时左右，遇难于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附近。亲属于6月10日在友谊医院太平间见到遗体。
左图为戴金平与姐合影。



程仁兴，男，遇难时25岁，湖北省人，生前为武汉华中师院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87级双学位毕业生。
89.6.4凌晨于天安门广场国旗杆下腹部中弹，送北京人民医院因未能及时抢救，流血过多死亡，程的遗体11天后由其女友及来京料理后事的大哥从医院领回。程仁兴为程家唯一上大学的儿子。
左图中为程仁兴母亲。



田道民，男，遇难时22岁，湖北石首市人，生前为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85级学生。
89.6.4.清晨，田做完毕业论文后去六部口，被坦克碾死。



王培文，男，遇难时21岁，陕西咸阳市人，生前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86级学生。
89.6.4.凌晨，王走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头排，在六部口被坦克轧死，尸体轧碎。

前排右起第一人为王培文。



张福元，男，遇难时66岁，生前为解放军302医院退休工人。张遇难前在冶金部设计院大楼建筑工地（军博对面）值班。6月3日晚下班后，去北京长话大楼东墙外一条胡同里的亲戚家串门。很晚的时候，外面释放瓦斯弹，屋里很呛人，因这家离马路（西长安街）很近，大家就跑到门口去看个究竟，刚到胡同口，军队朝胡同口的人群开枪扫射，张的右腰部中弹。当时，张与人群一起往胡同里逃，军队还不停地往胡同里开枪。张刚逃进亲戚家的院门就倒下了。救护车把他送进积水潭医院后立即死亡。4日张的子女领回遗体。



马承芬，女 遇难时55岁，北京市人。1949年参军，参加过抗美援朝，53年回国复员，属铁道兵。89.6.3.晚，与楼内邻居在院内(水利科学院对门)纳凉，遭行进中的军车射击，腹部中弹，送304医院抢救无效，于6.4凌晨身亡。马死后，其夫曾多次给军队系统写信反映，一直无回答，92年由其夫个人出资将骨灰葬于金山陵园。



郝致京，男 遇难时30岁，安徽马鞍山市人，生前为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88年曾访问过美国。
89.6.3.晚11点多，在木樨地左胸中弹，死于复兴医院。家人于7月4日才找到尸体，骨灰安葬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何 洁，男，遇难时23岁，黑龙江宝清县人。
何15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为大学本科，87年由清华推荐免试录取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生。
89.6.3.晚，何与同学一起去天安门，于南池子遇难，北京医院“死亡证明”为“颅脑损伤”（脑部中弹），于6月4日3点40分去世。时年23岁。骨灰由家人带回黑龙江老家，葬于完达山脉的小青山上南山陵地。右图为何父为亡儿扫墓。



蒋捷连，男，遇难时17岁，北京市人，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中高二四班学生。
89.6.3.夜10:30左右从家中卫生间跳窗离家经木樨地去天安门广场，11点多戒严部队强行突进至木樨地，在复外大街29楼前长花坛后遭枪杀。中弹后对同伴说：“快跑！我可能中弹了！”随即倒下。子弹从后背左侧穿胸而过，伤及心脏，送市儿童医院抢救无效身亡。医院开具证明“来院前已死亡”；为6.3夜木樨地地区第一批遇难者。6月7日于八宝山火化，骨灰一直放置在家中灵堂内。



王楠，男，遇难时19岁，北京市人。生前为北京市月坛中学高二学生。
89.6.3.夜11时，携像机离家，6.4.凌晨在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倒地，戒严部队禁止救护队抢救，两、三小时后身亡，当即与其他尸体被埋于天安门西侧北京市28中学校门前绿地内。6.7.尸体发出异味，经校方交涉，将尸体挖出，因穿着军服被疑为戒严部队士兵，送往护国寺医院，其家人6.14.才找到，于6.26.经市公安局出具“外出死亡”证明于八宝山火化，骨灰安放在万安公墓骨灰堂。



叶伟航，男，遇难时19岁，北京市生前为北京市57中高三学生，班长，学生会干部。
89.6.3.凌晨2点左右，于木樨地中弹，亡于海军总医院，为该院第一号无名尸，身上三处中弹，一为左臂贯通伤，一为右胸封闭伤，一为右后脑封闭伤。家人于6月5日找到尸体，骨灰安放在家中。



石岩，男，遇难时27岁，辽宁大连市人。
生前为空政文工团演奏员。
89.6.4.凌晨，头部中弹，红十字会救护车送至北京人民医院时还没有停止呼吸，后抢救无效死亡，于八宝山火化。



倪世联，男，遇难时24岁，山东省人，生前为北京石油大学毕业生，石化总公司北京设计院工作人员。
89.6.3.晚11时许，倪与其他6位青年骑车自地质医院出发，约11时至西单，倪胸腹部中弹，民众送宣武医院抢救，不治身亡。90年单位出具“非正常死亡”的死亡证明书，并作如下政治结论：“违反戒严令，后果自负”，一次性发给10个月的基本工资835元。当时与倪一起受伤者有曹长韧、王建伟两人。



邝敏，男，遇难时27岁，北京市人，生前为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生、北京叉车总厂工程师。
89.6.3.夜，于木樨地中弹，子弹从右腰后部射入从右腹前穿出，送到医院后立即死亡。骨灰一直存放在家中。



彭 军，男，遇难时30岁，北京市人，生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

89.6.5.早上6点40分左右，彭从朝阳区东大桥的住址出门，准备去买早点，途中遇戒严部队扫射，身中两弹，一处在脚踝处，另一处从右后胸射入，左前胸爆出，经送朝阳医院抢救，无效身亡。



周欣明，男，遇难时16岁，北京市人，生前为雪花电器公司技术学校一年级学生。

(1973.3.4生)

89.6.4凌晨，在民族宫前，为救援伤员被子弹击中肋、肝部，从右背下方穿出，子弹为炸子，肝部粉碎，送积水潭医院，已无法手术，凌晨5时死于手术室。安葬于金山陵园。



杨燕声，男，遇难时30岁，北京市人，生前为体育报社工作人员。
89.6.4.凌晨，在正义路口抢救伤员时，腹部中炸子，被送往北京医院，不治身亡，骨灰安放在万安公墓骨灰堂。
图为杨燕声和妻子的合影。



张向红，女，遇难时20岁，北京市人，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国政系国际共运专业87级学生。
89.6.3.夜11点多，与兄嫂多人从珠市口亲戚家出来归家的途中，在前门遇戒严部队受阻，并被冲散。张与嫂一起躲在前门西侧树丛后，被子弹击中左胸主动脉，穿透后背，送市急救中心，6月4日凌晨去世。骨灰葬于太子峪公墓。



张 瑾，女，遇难时19岁，北京市人。生前为国贸中心外事服务专业学校毕业生，国贸中心培训班学员。
89.6.3.夜12时多，与男友一起躲在民族宫附近的胡同里，遭戒严部队扫射，头部中弹，6月4日凌晨死于邮电医院。6月14日火化，骨灰安葬在太子峪公墓福南区第4排。



寇 霞，女，遇难时31岁，北京市人。生前为北京市西四北幼儿园教师。
89.6.3.夜，在军事博物馆对面人行道上腹部中弹，送铁路医院抢救，因伤及脾脏，于6月4日下午5时身亡。



刘锦华，女，遇难时34岁，北京市人，生前为白石桥总政政治部干休三所职工。
89.6.3.晚9点，与其夫(受伤)从八里庄去永定门外姑姑家给孩子取药，至西单，遇戒严部队，返回；11点左右至木樨地燕京饭店处，遇戒严部队扫射，两人躲入木樨地21楼边的小胡同，士兵追入胡同射击，刘上额中弹，立即死亡。

“六四”坦克碾人真象

【作者:雨源】



“六四”事件已有近 12 年了，“六四”事件使一批人得了益，但更多的人却为它倒了霉。作为亲历“六四”事件的普通学生，血腥惨案的见证人，看到和听到周围的人已经淡忘了此事，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六四”镇压有利于国家的时候，心中特别悲哀。我想应该让大家知道一些事实，请大家不要忘记因“六四”而牺牲的普通死难者和那些屠杀他们的刽子手们。

六月三日下午 △ 六月三日下午，我在围观了西单公共汽车（“六四平暴”镜头中，几个学生端着枪向群众展示）和新华门附近小中巴（里面有很多枪支）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这时广场的帐篷里已经没有几个学生了，只是靠广场西侧的一个大帐篷下，还在展出着一些从进城便衣部队那里缴来的菜刀匕首棍棒和绳索等。尽管如此，大家当时仍然只是猜测，军队只是想化装进城，以便躲过市民和学生的阻挠。看起来，军队可能要把学生从广场撵走，清理天安门

广场了。所以我们几个一起来的同学决定回校吃饭，晚上再来广场坚守。

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广播里传来北京市的通告和一些有关军队要进城的传言。我们几个刚吃了些方便面的同学商量了一下后，决定去广场支持那里的学生。然后，我们一行十几个人骑着单车，打着大旗，沿着学院路向南骑去。一路上，路旁的市民和学生不断地向我们欢呼，同我们一齐高呼口号，气氛非常热烈，但谁也没想到一场大劫正在向着北京袭来。

当我们到达车公庄的时候，那里已有一串被群众自发拦住的军车，卡车上挤满了军人，他们都没有武器，只有少数几个车上的军人头上戴了钢盔。群众一见到我们举着大旗到来，马上跑过来拦住我们，请我们帮助指挥，拦住这些军车。于是，我们十几个人分成好几个小组，每组分别指挥群众包围着一个军车，向他们讲道理作宣传。同时，我们也负责劝阻老百姓，不让人伤害军人和军车。整个车公庄大街的军人和群众都在有序地僵持着，军人站在车上，群众和学生在车下宣传。

子夜 △ 约莫过了两三个小时后，大概在快十二点的时候，忽然有传说军队开抢了。不久，就见从二环路南面跑来了很多人，其中有的人身上沾满了血迹。这下，整个车公庄都乱了，群众再也控制不住了，他们开始群起掀军车。车上的军人只好跳下汽车，汇集聚拢到了一堆。这时，有的市民和学生开始打砸军人。当时我看到，有好几个可怜的军人的头被石头砸得鲜血直流。我们几个同学无助地看着发生的一切，看着这批可怜的军人簇拥一团，挤向了地铁站。

群众饶过了这批军人，但无法饶恕这些剩下的军车。于是，一辆辆军用卡车和吉普被点着，我们亲眼目睹着这十几辆军车，化成了熊熊大火。约一两点钟的时候，我们十几个同学又聚到了大旗下，商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我们周围围了很多市民，当他们听见我们要去广场的决定后，死活拦着我们，不让我们去白白送死。我们向他们解释说，广场上仍有很多同学在坚守着，我们一定要去支持他们，把他们救出来。在我们的坚持下，最后他们同意放我们去了，但坚决不让我们打着大旗去，因为听说军人一见大旗就开枪。这样，我们只好把大旗交给了这些素不相识的市民，开始骑车向复兴门奔去。（“六四”后，我们几经打听，得知市民已把大旗完好地保存起来。他们告诉我，待到“六四”平反的那一天，他们一定会把它再打出来的。我非常感激这些不知名的父老乡亲，正是这些正义的人们留住了这面红旗，使我们几个能够化险为夷。否则，我们也许就象那些在长安街倒下的学生一样，永远也回不来了，因为我一直都在打着那面大旗，而我的几个同学是始终都在大旗的四周的。）

我们骑着单车从复兴门上了长安街。这时间正是军车已经开过去了的空隙，我们沿着长安街向东骑行，路上没遇到什么险情。当时的长安街灯光昏暗，充满了血腥和恐怖，街两旁的临时工地的围墙和薄铁皮门上布满了枪眼。当我们快到六部口的时候，一辆正燃烧着的装甲车里面的子弹还正在“霹雳啪啦”的爆着。这时候，西面开来了一些军车，我们十几个人马上和周围的人一起躲向了路边，我们十几个人也一下子失去了联系。我们其中的一个同学就是这时中了一枪。侥幸的是，他当时正半趴在另一个同学的头上，胳膊搭在中间，子弹正巧从他的头下和那个同学的头上，穿过了他的右臂，若子弹或上或下一点，那就肯定会击中他的或另外那个同学的脑袋了。

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小王仍没跑散，待军车过后，我俩开始小心翼翼地步行，沿长安街南侧墙跟儿向东移去，我们的生死经历就从这开始了。

挡军车 △ 这时的六部口与新华门之间的长安街上空无一人，不时的枪声加上昏暗的灯光映照下的长街，让我们觉得特别恐怖。我和同学小王沿着长安街的南墙根儿，慢慢地向东试着移动，生怕半中间杀出一路军人或扫来一梭子子弹。还算走运，我们没遇到任何意外便到了新华门的附近。当时的新华门附近就象死一样的寂静，甚至连个站岗的都看不见。当时我们想，那门里面一定埋伏了许多军人，一旦有人靠近，肯定必死无疑。我和小王最后还是颤颤巍巍贴着南墙根儿，挪过了新华门对面。再往前走些，我们终于遇到了一群市民和学生（约有几十人，看上去多数是学生）。我们一见到这么多人，胆子马上又壮了起来，刚才的恐惧也顿时消失了。

不一会儿，从长安街西面，又开来了一大批军车和装甲车，卡车的四周围着帆布篷布。我们一下子都闪到了路两旁。由于长安街太敞，根本无处躲藏，我们只好趴在人行道上或蹲在小树后。不过，这批军车倒是开枪不多，只是偶尔地，从驰过的卡车的两侧冒出几枪。由于长安街两旁连个石头也捡不到，我们只能躲在树后漫骂，也有几个人撬起了人行道的方砖，摔碎成小块后，向驶过的军车投去。

这次军车断断续续地过了约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的人群又开始聚到了一起，这时的人数已比刚才多了些，大家开始相互攀谈起来。当谈到无人得知天安门广场的情况时，大家都想冲进广场，去救那里的学生。也不知谁先打的头，我们相互挽起手来，横在长街上组成了一个人墙，然后开始唱着歌（我记得好象是国歌和国际歌等），手挽着手，向东面的天安门广场行进。当行至离大会堂西侧路约一百多米时，我们已经能看到路前方站列的军人人排了。

我们仍然继续高唱着前进，当我们行至离军人不到几十米的时候，我们已能模糊地看到前面的军人排正在平端着枪对着我们。突然，我们看到了正前方霹雳的火光，同时也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和哭叫声。前面开枪了，我们的人排一下子倒下了许多，人们一下子就散了开来。我右边挽着的一个学生，一个踉跄倒了下去，我差点被他带倒在地。我猜他是中枪了，忙和另一个人把他架起来就往回跑。所幸，军队并没有追赶，最后我们在离军队大概二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军队这时也停止了射击。（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当时，的确很多枪都是朝天放的，否则的话我也没命了，但我肯定当时也有不少是平射的，因为我们当时一下子就倒下了许多人。）

中弹的人们很快被车推人背地架离了长安街。过了好大一会儿，人们才又聚了起来，这时我们的人又多了一些。我们又开始组成人墙，手挽着手，高唱着歌向天安门方向行进。和上次一样，当我们离军队几十米的地方，军人又开了枪，我们又被打了回来。这样反反复复约有四五次，每次我们的人数都在增加，而每次也都有中弹的被架回来。只不过，中弹人数远少于第一次的罢了。记得有一次，我旁边的又一个同学中了弹，被我和另一个人架着拖回来。我后来才看清，他的裤子大腿上被打了个黑洞，黑洞里一劲儿地向外冒血。虽然每一次前进，我和小王都是走在头排，但幸运的是，我们俩一直都没被击中。

坦克布满长安街 △ 记得最后一次行进时，天已经亮了。当行至离军队约有五十米的样子，我们已经能看清对面的军人，他们正平端着枪对着我们，我们几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对面黑洞洞的枪口。因此，我们自然地放慢了前进步伐。当时，由于长安街太宽，我们的人排自然形成了弧形，我和小王站在中间偏右的地方。当我们距军队约五十米的地方，路两侧的人们已经距军人只二三十米了。可能是天亮的原因为吧，这次虽然离军人非常近，但中间的军人只向天上鸣了几枪，只是路两旁多了一些手举大白棒子的军人，不断地挥舞着大棒，追打路两旁那些靠近他们的人群。这时，我们也不敢再往前了，只稍退了一点，开始和军队人排对峙站着，中间约有五六十米的样子。

后来，我们开始高呼口号，唱国歌和国际歌等歌曲。对面的军人听到我们唱，也和我们对着呼口号和高唱歌曲。只要稍有人向前，路两旁的大棒就追打过来。因此我们中间始终与前方的军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们就一直这样僵持着。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的样子，奇怪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正前方的军队人排突然停止了呼口号和歌唱，人排中间突然撤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我和周围的人都愣住了，都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正在我们发愣的时

候，前面传来了“轰隆”声，这时，我们才看到，从广场方向开来了一队坦克，为首的一辆开到军队人排撤出的口子后，停了下来。接着后面又上来了很多坦克，它们开始列队，在第一对并排的坦克后，排着第二对，并且它们错列行在第一对坦克未能覆盖的空间上，然后是第三排。这样一来，整个长安街便布满了坦克，再无它们不能碾过的地带。我们看到这，才定了点心，猜测军队可能是想用坦克代替军人和我们对峙的。

然而坦克并没停下，反而开始向我们开来。这时候，也不知道那个不要命的，首先躺到了马路上，别的人看了，也跟着躺了下来。转眼已有数百人躺了下来，宽敞的长安街上黑压压地躺了一片人。当时我和小王都站在前排，看到别人都躺下了，也就一闭眼随着躺在了路中间，心想是死是活随他去吧。我转念一想，要牺牲也得牺牲得壮烈点吧，所以才又睁开了眼。当时我和小王都在第一排，我是头朝西躺的，所以能看到东面坦克开过来的情形。

六部口毒气弹，五个被碾死的学生 △ 坦克对着我们越开越快，马上就要碾到我们的人群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当第一辆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北侧五六米远的人群时，突然一个急煞车，急停了下来，我记得当时的马路被震得乱晃，整个坦克的上身都往前冲了一下，在离第一个人不到一公尺的地方才停住。我正前方的坦克这时离我还有十几米，也随着第一辆停了下来，接着所有的坦克都停了下来。紧接着，坦克仓门打开，军人开始向我们和路两旁扔毒气弹。霎时间，黄烟开始弥漫长安街，我和小王几乎随着所有的躺在地上的人们，一下子跳了起来，逃向了路南侧。我跳到路边，顺便往东看了一眼，当时我的肺都要气炸了，刚才与我们对峙的士兵们，看到我们狼狈鼠窜的样子，正在举枪跳跃欢呼着，我这一生都是不会忘记这批惨无人性的邪恶军人的。



毒气弹象易拉罐大小，当时吸到肚里，只觉得舌干胸闷，直想吐，我和小王开始不住地干咳。这时，我和小王看到一个刚扔到身边的毒气弹，他捂住嘴想捡起来扔向坦克，我看着黄烟“噗”地一下涌了出来，小王几乎被掀翻在地。我对他喊了一声“跑吧！”我俩几乎同时开始向西跑去。这时的坦克已经形成正式队形开始向西压。由于路南道窄，毒气也太多，路北是中南海院墙，因此，我俩想斜着穿过长安街，沿着中南海院墙往西跑，这样也许会安全些。所以，我俩斜穿长安街向西北跑去。因为路上到处都是黄烟，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我俩一下子就跑散了。也因为黄烟，我几次都差点儿撞到行驶的坦克上，坦克也差点儿撞到我。

也许我命大，或许是当过运动员跑得快的原因，我终于幸运地斜穿过了长安街，开始沿着中南海的红墙向西跑去。由于这一侧是树木花园，坦克并没压上来，所以跑起来安全多了，只是吸的毒气太多，胸腔无比地难受。当我跑过新华门时，门前密密地站了一排士兵，他们全都倒背着手直直地立着，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跑过去。当时，我真怕他们把我们往公路中间撵，那样的话，我们可就要糟殃了。勉强跑过新华门后，我的胸部实在难受，只好蹲下来抓了一把泥水（喷水龙头溢出的）往嘴上一按，接着再往西跑。不一会儿，我便跑到了六部口。这时，坦克已经在我之前到达了，于是，我赶紧右转，向北又跑了几十米，当我看到已经停了许多学生，也没有坦克追过来时，才停了下来。当时，很多年轻人都正蹲在或趴在地上呕吐干咳，几个女学生模样的干脆横趴在人行道上，把头伸出路基干吐，样子看上去难受极了。我的胸部也非常难受，只得蹲在地上吐了一会儿，结果什么也没吐出来。过了一会儿，我觉着好些了，看到六部口的坦克已停住了，我想找找小王，看他是否也已安全逃出，才又壮

起胆子往长安街走去。



这时候，长安街上弥漫着的黄烟已经淡了一些，但稍远一点还是什么都看不见，因此谁也说不清究竟死了多少人。虽然当时的坦克还在发动着，但轰鸣声已小了很多。我隐约能听到六部口对面的哭声。我壮着胆子从最西面的坦克前绕了过去，来到了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南角。当时到处都是哭声，待我走近一看，我一下子呆了，眼泪就象流水似的一下子涌了出来，坦克附近的情形太惨了，我实在控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五个被碾死的学生横乱地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个离人行道二米多远，头朝着西北仰面躺着，脑袋中间开了个大洞，象豆腐脑一样的白脑浆，参杂许多红血丝向前刺出一米多远。另外四个倒在他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个被压到了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到了一起。我和周围的人站在那里哭了一阵儿，当我看到身旁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便哭着同他们商量看是否能把这些尸体抬走，免得被军人抢去消尸灭迹。那几个学生和我一起走到邮电所西面的一个胡同，向一个住户要了一块木板，约一米多长，半米多宽，钉在一起的木板子。在周围人的帮助下，我们开始一具具地抬尸体。



坦克碾压后的肉酱(3)。相关照片：坦克碾压后的肉酱(1) / 坦克碾压后的肉酱(2)

一具具地抬尸体，送到政法大学 △ 当时的坦克就在旁边响着，我们流着泪，也顾不得害怕了。我已经记不清先抬的那一位了，好像是先抬的那个脑浆被压出来的学生。当时由于木板太短，他的头顶在我的肚子上，脑袋已经空了，但我的衬衣上仍然沾了一些脑浆。抬另一个内穿红背心的学生时，他的一只右臂和上身只联了几丝肉，基本上已经掉了下来，红背心和肉绞在了一起，大腿上的五花肉也翻了出来，我拿着他的右臂放到他的肚子上，然后把他抬了出去。还有两个学生已经和自行车碾到了一起，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将一个和自行车分开。而另一个被压得自行车的脚蹬子刺进了胸腔，我们实在无法将尸体和车子分开，只好连同压扁的自行车一起抬了出去。



**Il a les jambes
broyées par un
tank**

64memo.com

**1. 4 JUIN
6 H 15 : LE PIÈGE**
Un cortège
d'étudiants a quitté
Tian Anmen par le sud
et tente de rejoindre
l'avenue Chang'An.
Arrivé au carrefour
Liu Bu Kou, à
50 mètres du siège du
gouvernement et du
Parti, il tombe sur
trois chars qui sortent
de la place. Un tir très
nourri de gaz
lacrymogènes enfume
l'air. Des étudiants
tentent d'éviter les
chars qui foncent
dans le tas en
escaladant les
barrières.

**2. 6 H 20 :
L'HORREUR**
Les trois chars sont
partis, les gaz se
dissipent. Des
témoins se précipitent
sur un blessé qui
s'accroche à la
barrière. Sur la
chaussée, il y a onze
morts.

**3. 6 H 20-25 :
LES MARTYRS DE
LIU BU KOU**
Deux hommes tentent
de poser des garrots
sur les jambes
arrachées d'un des
étudiants piégés
à Liu Bu Kou.

记得我们抬最后一个尸体的时候，从长安街西面又开来一批坦克。我当时正拿着木板朝东蹲着准备抬尸体，根本没注意背后的事。突然间，许多市民和学生都冲着我喊叫起来。我回头一看，一辆最边上的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了，我条件反射地扔下木板，跳到了人行道上。转眼这辆坦克已经驶过，停在了前方，再看一下刚才的木板，约一寸厚的木板的一角已被压得象麻片一样，我被刚才的情形吓出了一身冷汗。

最后，我们终于把五具尸体抬到了街后的一个胡同里。当时，有人建议我们检查一下死者身上是否有证件，以免一会儿军人把尸体夺走了，我们还不知

道死者是谁。我们翻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只从一个绿背包里，翻出一个女学生的学生证（女生名字我已记不清，只记得是北京XX学院的）。尸体总放在胡同里也不行，我们正发愁时，正巧来了个好心的个体司机，他流着泪建议我们把尸体送到政法大学去，以备作为法律证据。我们听从了他的建议，把五具尸体（一个连着自行车）抬上了他的小卡车上。由于害怕大路上军人抢尸体，司机师傅带着我们沿着小胡同开了很久，才上了二环路。路上他还对我们讲述了他这一夜是如何抢运尸体，一直到现在的所见所闻。由于五具尸体是迭放在小卡车上的，车子只好开得很慢，这时的汽车前后已经跟随了許多人。

汽车上了二环路后，人们骑着自行车前后围着小卡车，护送着这辆小卡车行向政法大学，一路上护送的自行车群越聚越多，当我们到达政法大学的时候，已有数千师生在校门口迎着我们，我们的前后也跟了上千人。当我跳下汽车时，一位教授模样的老人，噙着泪水抱住了我，我就象一个在外受屈的小孩，好不容易回到家里一样，趴在他身上嚎啕大哭起来。我记得，当时整个大街上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满街都是哭泣声。

最后，一位陌生人，让我搭上他的自行车把我送到了学校。当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左右了，许多同学已在校门口等了一上午，他们多数断定我是肯定回不来了。我们一见面，一下子涌到了一堆。至于后来的尸体存放和展览的事，具体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只是后来听说，尸体在政法大学的一楼大厅里，停放了好几天，北京市数以万计的人目睹了这五个被碾学生的惨状。

他永远地失掉了那只胳膊 △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那个同学小王也已安全地在我之前返回了学校。我们跑散后，他也差点儿被坦克撞倒。当他跑到六部口的时候，看到一个躺在地上还活着的学生，臂膀几乎已经被碾掉了下来，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但惊人的是，他在小王的慌乱搀扶下，竟站了起来，并能坐上一个自行车，扶着自己的那只胳膊逃了出去。六四很久以后，一个偶然的机 会，我得到了这个学生的下落。这时他已经永远地失掉了那只胳膊，也被迫离开了他所在的那所大学。

我是流着泪，写完这段回忆的。我由于害怕牵连受迫害，一直将此事沉默着。看到“六四”事件已经马上12年了，我想我应该把我亲身经历的“六四”血案的一个角落告诉大家，请大家不要忘记“六四”的死难者和刽子手们.....

眼泪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是边擦着边读完这曾经发生的故事！ -老马放心，至少我不会忘，我留这那时拍下的一切，等着重见天日的哪一天!!!!

那天早上我就在法大校门口，看见五具尸体从130卡车上用门板抬了下来。这一幕我终生难忘，当时在场的人都在流泪。

雨源，「“六四”坦克碾人真相」，罕见奇谈六四论坛
http://*/TextBody/13681.asp 2001年4月。

lastModified: 11/23/2005

相关资料

雨源：“六四”坦克碾人真相，2001年4月。

网络图片：六部口坦克下的冤魂(2) - Time magazine——自行车上的尸体，1989年6月4日7时。

网络图片：坦克追碾撤离广场的学生(2/3)——坦克追碾后学生的尸体/六部口坦克下的冤魂，1989年6月4日6:20时。

网络图片：坦克碾压自行车、血迹(残骸)，1989年6月4日。

网络图片：坦克碾压自行车、血迹(全景)，1989年6月4日。

把酒问青天：38军在六四——共15099人、851辆汽车、213辆装甲车和33辆坦克，2003年1月5日。

网络图片：坦克碾压后的肉酱(3)，1989年6月4日6:20时。

网络图片：六部口坦克下的冤魂(4) - 美联社——自行车上的尸体，1989年6月4日7时。

网络图片：坦克追碾撤离广场的学生(全图)——六部口坦克下的冤魂，1989年6月4日6:20时。

网络图片：坦克碾压后的肉酱，1989年6月4日6时。

网络图片：坦克追碾撤离广场的学生(3/3)——他的双腿被坦克捣碎/六部口坦克下的冤魂，1989年6月4日6:25时。

网络图片：坦克碾压后的肉酱(2)，1989年6月4日。

网络图片：六部口坦克下的冤魂(6) - 北京网友——自行车上的尸体，1989年6月4日7时。

方政：方政：我被坦克碾断双腿——六四伤残者证辞，1999年2月21日。

网络图片：坦克追碾撤离广场的学生(1/3)——坦克追碾从广场撤离的学生队伍/六部口坦克下的冤魂，1989年6月4日6:15时。

“六·四”事件民间白皮书

前言

《“六·四”事件民间白皮书》由“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暨‘六四’惨案20周年活动第一批联络人”发起并由李进进法学博士完成写作，胡平（思想家、哲学和政论作家），严家其（政治学家，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王军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丹（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杨建利（加州伯克利大学数学博士和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徐文立（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美国布朗大学资深研究员），陈破空（政论家和作家），王天成（宪法研究专家，前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以及刘路，易改，张菁参与了讨论或提供了修改意见。支持写作的还有以下组织和个人：

中国宪政协进会

公民力量

关注中国中心

“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

《北京之春》杂志社

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

中国民主团结同盟

中国社会民主党

中国民主论坛(纽约)

中国工人自治联合会(纽约)

澳大利亚悉尼中国民主平台

纽约天安门基金会

万润南、王书君、王传忠、王超华、方能达、孔天乐、孔灵犀、叶宁、冯海光、
吕京花、朱学渊、刘刚、刘念春、刘俊国、羊子(冯素英)、孙立勇、孙延、苏
晓康、吾尔开希、李兰莉、杨而玉、李恒清、吴仁华、何军樵、何清涟、沈源、
宋书元、张伟国、张伦、陈一咨、陈二幼、陈小平、陈立群、陈奎德、武春来、
金岩、周义澄(亚衣)、周锋锁、郑义、郑存柱、孟浪、项小吉、袁滨、高文谦、
高平、高光俊、唐元隽、陶君、梅凤杰、盛雪、康正果、程晓农、傅申平、傅申
奇、储海蓝、曾大军、谢中之、谢选骏、熊炎、潘强、魏泉宝。

这个白皮书是基于现披露出来的官方社论、公告和报告，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文章，报纸报道以及音像等史料对“六·四”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做出的一个完整的政治背景和法律分析的报告。目前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没有作出全面的调查和客观的评价，迄今未见类似白皮书之类的调查报告。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封锁有关“六·四”资料和禁止民间对此事件的调查和讨论。作为民间的力量，我们提出这个民间的白皮书，一方面是对历史的负责，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现政府的抗议和挑战。这个报告以白皮书命名，旨在强调它的严谨、正式和规范性，以及阅读对象的普遍性。

纪念“六四”事件委员会 2009年4月27日

一、引言

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在二十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最让世界关注的是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在 1989 年 6 月 4 日以血肉之躯只身阻挡针对平民的军队坦克。1989 年 6 月 3 日中国当局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强行进驻北京和占领天安门广场，在此过程中军人们受命向非武装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开枪，导致了大量伤亡。那一刻环绕着地球的是这样的声音：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1]

这是中国当局自己的电台播出的新闻，是其编辑根据他在上班的路上目睹的情况所写出的报道。新闻播出后不久，即 1989 年 6 月 4 日的凌晨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强行占领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上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在军人枪口的押送下，撤出天安门广场。这就是让世人震惊的 1989 年“六·四”大屠杀事件。

有关中国军队向平民开枪造成大量伤亡的报道，以后不断有录像、照片和当事人的回忆证实。中国官方也从未否定军队动用了武力并造成了大量的平民的伤亡。但是他们说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多年后，中国当局一方面避忌提起“暴乱”和“平暴”而讳称是一场“政治风波”[2]，另一方面坚持说 1989 年发生了否定共产党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声称“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3]

中国政府在屠杀后的立场使“六·四”屠杀真相没有全部披露出来。同时，所有受难者至今仍然被官方称为“暴徒”，他们的在天之灵至今得不到安抚，受伤者包括那被坦克辗断双腿的体院学生方政等，今天仍然没有得到赔偿和补偿。

二十年来，中国当局在国内封锁对“六·四”屠杀的报道和讨论，使得许多年轻的一代人不知道这个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让经历过来的人忘却这个事件。有位年轻的报社员工居然以为“六·四”是一次矿难。[4]

我们不能忘却，我们必须厘清被屠夫们搞模糊的历史真相，我们必须看清历史事件的性质。为了那些死难者的灵魂得到慰藉，为了避免这种反人性的屠杀事件再度发生，为了中国人民享受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本白皮书将根据当时中国国内报章和电台、电视台的报道

和 20 年来不断披露出来的回忆录和采访文章等，根据中国当时的宪法和法律，根据人们心中的正义观，来分析和解答当时发生了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北京到底有没有发生“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对北京市的戒严是否违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平暴”是不是屠杀，以及“六·四”事件对世界的影响和我们的历史反思。最后，我们提出“八九”民运没有完成的诉求。

【注解】

[1] 转引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六四事件”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5%9B%9B%E4%BA%8B%E4%BB%B6>。

[2] 最早由邓小平在 1989 年 6 月 9 日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所讲，《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3] 以下是中国政府对 1989 年天安门事件简短的标准答案：标题：“1989 年政治风波”：“80 年代末社会上掀起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自由化分子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此影响下，1989 年 4 月初，北京一些高校的青年学生针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形成学潮。4 月 15 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但是极少数人自由化分子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他们的煽动下，首都及地方一些高校的学生大批涌上街头举行游行活动，西安、长沙等地的一些不法分子趁机进行了打、砸、抢、烧，学潮迅速发展成为动乱。4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社论号召大家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制止动乱。但是，形势并没有好转。5 月 19 日晚，中共中央决定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少数暴乱分子煽动一些人与戒严部队对抗。同时，上海、广州等地也接连发生暴徒冲击党政机关、破坏交通设施等严重事件。对此，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暴乱。这场政治风波破坏了我国正常的社会秩序，扰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进程，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5833/65839/66944/4514254.html>。

[4] 美国 VOA 电台 2007 年 6 月 6 日报道“中国成功封锁六四，年轻人不明其意”。报道指出在《南方日报》和《成都晚报》上注销纪念“六·四”的广告，原因是年轻职员不知道“六·四”而认为是一次矿难。

<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7-06/w2007-06-06-voa43.cfm?CFID=153288132&CFTOKEN=68643962&jsessionId=843054fb8efc6abc8a30e2d462293b1e6239>。

二、事件的经过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的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的人民请愿活动即“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中国政府动用约20万人的军队强行推进北京，镇压了那场爱国民主运动，造成了约上万平民的伤亡。这就是“六·四”屠杀。以下是这个事件的主要过程。

“八九”民主运动爆发的背景简介

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在七十年代末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垮台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带来两大反思和诉求，一是要求人身和思想的自由，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要求，另一是要脱贫，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口号。1978年5月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代表了第一种反思。但是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在完成了对文革冤假错案平反的任务、在邓小平复出并全面掌握国家政治权力后就开始受到压制，作为官方支持的思想解放运动就基本停止了。但是，人民继续在反思，故出现了西单民主墙和北京高校的竞选人民代表的活动，也称之为北京之春运动。中共当局在文革结束后不到4年的时间里就镇压了西单民主墙。人们畏惧和痛恨的反革命罪这条鞭子又开始在人民头上挥舞。1980年，邓小平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以桎梏人们的思想；1983年中共当局进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1987年初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受到进一步的压制。

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其出发点是为了摆脱文革式政治，不搞政治运动。但是，这个指导思想是以不挑战中共的权威为前提和牺牲人民民主和自由权利为代价的。这个指导思想意图取缔意识形态上的各种争论。总之它是一个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跛脚的改革思路。然而，进行经济建设和“不搞政治运动”本身就是政治。如何实现现代化本身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争论。思想和政治权利上的长期压制使得人民寻找释放的机会，挑战权威。当经济改革带来利益重新瓜分并导致分配不公的时候，当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的时候，人民必然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权威，邓小平不愿意见到的政治必然要浮上社会台面。1988年政府开始的物价闯关失败后导致高通货膨胀产生了大规模的民怨。社会分配不公和政府官员的“官倒”即腐败问题使社会矛盾加剧。这种民怨和反“官倒”是八九年学潮的社会基础。

热血爱国青年感受到了那种思想上的压制和民怨，于是1986年底爆发了全国各大城市的争自由要民主的学潮。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实权派以传统的内部高压方式将学潮压下去了。他们逼迫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辞职，开除方励之、王若望、和刘宾雁等几位“资产阶级自由化”领头人物的党籍和职务，[5]并且发动了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可是学生们仍然在压抑当中。他们渴望着自由，期待着政治民主化。因为胡耀邦是在86年的学潮中下台的，他在1989年4月15日去世自然成为大学生们释放政治上的压抑和呼唤民主自由的一个历史契机。一场以悼念胡耀邦而开始的学潮发展成了一个震惊世界的人民请愿运动，同时世界人民也目睹了共产党屠杀的行径。

胡耀邦去世到“4.26”社论（4月15日--4月25日）

1989年民主运动起始于大学生们对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的悼念活动。1989年4

月 15 日，胡耀邦去世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北京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的学生们通过大小字报表达了对胡耀邦的悼念，也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的不满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大字报写的是“该走的没有走，不该走的却走了，”明显将矛头指向邓小平。4 月 17 日夜北京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拥着“中国魂”的特大横幅走向北京天安门广场。4 月 18 日他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七条”请愿书，内容如下：

- 1.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 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 3.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 4.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 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 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 7.对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6]

以上七条是 1989 年民主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归纳起来为两个请愿诉求：一是要求自由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二是反对腐败,即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反官倒”。其中没有提出任何选举在内的民主要求，没有要求更换政府，更谈不上推翻一个政府。当日学生们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静坐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的体育播音员宋世雄，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西平出来接受了“七条”。

当晚约 8 时左右，静坐的学生解散，但是静坐外围的学生拉着“中国魂”的横幅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所在的“新华门”前示威。这就发生了“4.19”和“4.20”所谓的“冲击新华门”事件。在这个事件当中，中央的有关报道强调“有人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因为大多数学生当时没有这种政治诉求，这种报道激化了学生的情绪。

4 月 20 日后，北京的几所主要大学开始组织学生自治会。中共中央决定在 4 月 22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追悼大会”。当得知北京当局将封闭天安门广场不让学生到天安门参加追悼大会后，北京主要大学的自治组织决定进驻天安门广场集体参加“胡耀邦的追悼大会”。4 月 21 日晚，各大学的学生突破封锁，凯旋般的进驻了天安门。中共中央在学生们已经进驻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下决定允许同学们在广场聆听追悼大会。大会结束后，几位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跪递”他们的请愿书，结果中国当局不予理睬。这件事情后，学生开始了罢课。

与此同时，上海，天津，西安，长沙，广州，武汉等外地的高校也出现各种大字报，声援北京的学生，提出了和北京的大学生们同样的要求。

胡耀邦去世后，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和戈扬主编的《新观察》4 月 19 日在北京联合举办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世界经济导报》整理成 3 万字的长篇报道，并在第“四三九”

期用整整五大版刊印了这篇报道。在尚未发行之前，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市委要求该报总编辑钦本立删改其中关于一些敏感的文字，遭到钦本立的拒绝。钦本立顶住压力，坚持发行原版。于是上海市委决定要求收回发出的报纸，但是只收回 16 万份中的 2 万份。[7]后来，上海市委在邓小平“4.25”讲话的当晚，决定整顿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停职。这个事件导致了新闻从业人员和知识分子走上街头，要求新闻自由。

【注解】

[5] 邓小平 1986 年 12 月 30 日发表了反对自残阶级自由化的讲话，点了方励之、王若望、和刘滨雁的名字。他们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后受到被开除党籍和降职等处分。见《人民日报》1987 年 1 月 15 日，1 月 20 日，和 1 月 25 日。中共党的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参见：高皋《三头马车时代》，第 206-12 页，明镜出版社，2009 年。

[6] 关于“七条”请愿的内容，不同媒体的记载略有差异。本文的“七条”内容来自于当时亲自组织静坐并将“七条”递交给全国人大代表的李进进的回忆文章（见李进进《我在一九八九年经历的两个历史事件》，载陈子华等着的《欲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第 209 页，明镜出版社，2004 年，又见“博讯”网李进进博客《记“八九”年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http://www.boxun.com/hero/lijj/4_1.shtml。这里七条中的前六条和张良编着的《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 年第 7 版，以下简称《“六·四”真相》的前六条基本一致，但是《中国“六·四”真相》第七条差别特别大，为“7、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实行改选。”《“六·四”真相》，第 123 页。当时学生们根本就没有提出这么直接的民主要求。中共的领导人看到这点肯定不高兴。这条显然是被报告人篡改了，目的是进一步挑拨和加深学生和领导的矛盾。这个篡改很有意思，说明了共产党内部斗争的复杂性，也说明了我们在读《“六·四”真相》一书的时候，要特别记住，那些报道或报告是内部人加工给领导看的，不完全是事实，旨在影响领导的决策。

[7] 参见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 133-35 页，世界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

“4.26”社论到“5.13”绝食前夕（4月26日--5月12日）

4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主要学校和有关部门口头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指出中国发生了政治动乱，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即镇压。[8]

4月26日人民日报社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指出极少数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捣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这个社论是1989年运动的转折点。尽管社论说是“极少数人”，但是学生们认为那只是文字游戏，他们认为社论就是否定学生们的政治诉求，矛头就是指向全体学生。他们说“我们没有搞动乱”。于是他们没有屈服，再次走上街头。

4月27日发生了1989年学潮的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游行，游行表达的是反对“4.26”社论，学生们坚持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爱国行为，不是动乱。游行的前夜校园内外格外紧张，有消息传出来当局会派军队镇压，各派力量都在较量。可是学生们还是冲出了校园，走上了街头。游行得到了北京市市民的热烈支持。他们高喊“大学生万岁”并且送来了面包和水。当时最吸引人的口号是“妈妈，我们没有错”。[9]有的学生的母亲也到游行队伍，母女拥抱着，享受着那自由的一刻。事前布置的军警在北京市民和学生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4.27”大游行迫使政府有关当局开始和学生对话。政府在对话中没有表示出诚意。5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接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22届年会的代表团团长和高级官员讲话时，要求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和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10]赵讲话后，学生们宣布复课。

由于政府和学生的对话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央没有改变“动乱”的定性，政府对学生们的政治诉求也没有诚意予以接受，5月13日，在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来访前一天，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学生开始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

“5.13”绝食到宣布戒严（5月13日--5月19日）

1989年5月13日是一个悲壮和值得记忆日子。那天北京的大学生们开始了绝食。同学们头戴白巾用红笔书写着各种誓言。他们从北京大学南门出发。北大南门上巨大的白色横幅写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盼复还。”大学生的绝食宣言写到：

“我们最纯洁的爱国感情，我们最优秀的赤子心灵，却被说成是“动乱”，说成是“别有用心”，说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

“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地活着，因为我们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龄；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学习，祖国还是这样的贫穷，我们似乎留下祖国就这样去死，

死亡决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够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够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就没有权利去偷生”。[11]

学生们的绝食诉求也很简单：（1）要求政府迅速与学生举行实质性的真诚对话，（2）要

求政府承认他们没有搞动乱而是在进行一场爱国的民主运动。绝食由“绝食团指挥部”领导。
[12]

5月15日北京发生了声援学生们的大游行，舆论逐渐同情学生。中央电视台开始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之后北京市民包括警察和军事院校的学生都走上街头，声援学生，要求政府认真对话。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曾报道那几天北京每天有上百万人走上街头。此时，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已经波及到全国。许多大城市的学生和市民都走上了街头，他们也在当地的政府门前请愿并开始和当地政府领导对话。外地的学生还赶到北京参加绝食和声援绝食，并且组建了“外地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外高联”。

5月19日凌晨，中国的第一个自治工会宣布在北京成立。他们在其成立宣言中，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必须在廿四小时之内无条件接受绝食同学的两点要求。否则，工人们将从5月20日中午12时开始，全市工人总罢工24小时，并根据事态的发展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但除了一个工厂响应罢工外，北京没有发生全市性的罢工活动，原因是政府颁布了戒严令。
[13]

5月19日晚，中国当局决定在5月20日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戒严令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布，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并派解放军执行戒严，同时成立了“解放军戒严指挥部”。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因为反对戒严未出席“戒严”大会。在此之前，也就是在5月19日凌晨，他看望了广场上绝食的学生并且极富同情地用扩音喇叭对学生喊了话。赵之后就被软禁，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被剥夺自由，直到他在2005年1月去世。这一切都说明，当局无意采纳赵紫阳提出的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和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政治纠纷，没有诚意对话。他们一意孤行，要用国家的暴力来解决人民的和平请愿。

戒严到屠杀（5月20日--6月3日）

在5月19日晚宣布戒严后，从四月底就被调动的解放军[14]开始开往北京城执行戒严，说是“维护首都治安，恢复正常秩序。决不是对付学生的”。[15]可是北京的学生和市民们不相信他们，于是开始了一场反对戒严的活动。古都北京百年来经历了无数反抗政府的活动，见证了几个政府的更迭，但是没有一个政府命令军队进城镇压学生运动。北京市的妇女、老人、工人、政府官员、甚至有些警察，他们来到戒严的军车面前，劝说着满脸稚气的解放军“娃娃”，让他们撤军。军人们犹豫了。有些将军们也开始反对戒严。戒严中，北京各界人士继续走上了街头声援学生。天安门广场上成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同时，戒严也吸引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目光。

世界华人也以不同的形式和规模的活动声援学生。5月28日发生了全球华人大游行。香港市民参与的规模最大，在600万人口的香港，有一百多万人参加了大游行。5月30日，由中央美术学院和其他几所院校的学生赶制的“民主女神像”耸立在天安门广场。刘晓波、周舵、侯德建和高新即“天安门四君子”于6月2日发起《六二绝食宣言》，声言绝食72小时，呼吁知识分子“以行动抗议军管”，并提出“我们没有敌人，不要用仇恨和暴力毒化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进程”。[16]

以严家其为首的学者们同时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戒严的合法性

和合理性。全国人大常委会下次开会的时间是 6 月 20 日。包括 57 名（后有 4 名代表撤出）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的公开信要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别会议。他们要求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讨论“罢免李鹏总理”和“取消戒严”的议题，要求当权者按照宪法的规定和法律的程序来解决政治问题。学生们没有撤离广场，期待着人民的代表讨论和决定国家的命运。

军队在各种反对的声音下，在北京郊区停滞不前。本来，这是个让冲突各方和中共党内高层各个派别协商解决国内的政治危机的最好机会。可是，面对人民改革的呼声，特别是面对人民要求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政治纷争的要求，时任国家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邓小平及其追随者害怕“橡皮图章”的民意机构变成一个真的民意机构而摆脱了他们的控制，于是决定用武力来结束非暴力的和平集会和示威。这就导致了天安门“六·四”屠杀。

【注解】

[8]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在“4.26”社论公布之前先在各高校教师和党员中传达，其中有句话是“跳蚤顶不起被窝”。笔者亲自听了传达。但是这个讲话传达的时候，特别讲明是根据纪录。到今天，这个讲话也没有正式的文稿。参见《“六·四”真相》第194-199页，其中邓小平的讲话的内容很少。这让人怀疑，4月25日传达的讲话是否被人添油加醋了。

[9] 《中国妇女报》1989年4月28日，以“妈妈，我们没错！”作了详细报道：

（本报北京 27 日讯 记者墨宁、雷收麦、陈西林报道）“妈妈，我们没错！”——首都数万感到委屈的大学生今天上街游行。虽经北京市府有关部门、公安干警、学校一些领导和教师的耐心劝阻，未全奏效。

今天的情景表明，政府对近 40 所大学学生的这次请愿活动采取了克制、宽容的态度。记者看到，游行过程中，学生通过了多道警戒线，值勤军人和警察未与学生发生任何冲突。

尽管参加游行的学生对有些事感到有些委屈，但在标语中很少出现过激语言。

一条横幅上写着“我们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另一条标语上写着“和平请愿，反对动乱”……

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游行方阵中一条标语——“妈妈，我们没错！”

[10] 《人民日报》1989年5月5日。

[11] 请参见《六四民运志》<http://www.ngensis.com/june4/june4s.htm#3>。

[12] 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 260 页，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 1996 年 6 月。

[13] 见李进进“我在一九八九年经历的两个历史事件”，载陈子华等著的《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第 214 页，又见“博讯”网李进进博客“记第一个工人自治组织——北京工自联”，http://www.boxun.com/hero/lijj/5_1.shtml。

[14] 参见张世军“致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公开信”（“1989年4月20日，我随所在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全文见 http://bbs.creaders.net/life/bbsviewer.php?trd_id=341179。

[15] “戒严部队指挥部告北京市民书”，《人民日报》，1989年5月22日。

[16] 全文请见“64Memo--《六二绝食宣言》”，<http://www.64memo.com/b5/8828.htm>。（

“六·四”大屠杀（6月3日--4日）

在6月3日晚十时，学生们还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的时候，约20万人的戒严部队在坦克车的引导下已经分兵进军广场。[17]据资料披露，当局在6月3日下午4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强行进军北京市区，占领天安门广场，驱赶学生，进行所谓的“天安门清场”，并命令军队务必在6月4日早6时前完成清场任务。[18]当晚6时30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放戒严部队紧急通告，宣布“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19]以下是“维基百科全书”关于6月3日晚到6月4日发生的屠杀情况：

晚上10时后，天安门与长安街的形势急转直下。军队入城后遭到市民阻挠，军队开枪，其中木樨地是死伤最多的焦点。该处聚集数千人，部分人用碎砖头砸打（戒严部队），军队立即一排排冲上大桥，边喊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边向投石头的市民开枪。

从这时起，军队时而向天开枪，时而对（着）人群扫射，有人中弹倒下。民众不断向后退，高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杀人犯！”军队用冲锋枪向骂声扫射，约百名学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中，大部分立刻被送往旁边的复兴医院。复兴门外大街两旁的市民从自家窗户上探出头来痛骂，也有人从窗口上往马路上投东西，军队开枪还击，从木樨地到全国总工会约五百米左右的路段，两旁建筑物都被打得火星四溅，其中22号楼、24号楼两幢部长楼有3人在楼上被子弹打死，当中据报包括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汝尊的女婿。

根据BBC记者现场报道，解放军从卡车上不分目标的向人群射击；在天安门广场的一次扫射中，她自己被尸体绊倒，几码之外被当场射杀的还有两人，重伤倒地不起的两人；之前北京某儿童医院20分钟内送来40多名遭枪击的重伤者，其中包括妇女和老人，不少人是在自己家中中弹，其中有两人已死亡。有说一些死者遗体被戒严部队埋在各处，但说法并未得到证实，但一些录像却显示解放军直接在长安大街向市民开枪。

广场上的学生虽然知道镇压开始，但以为军人只用橡胶子弹和催泪弹，最多是被军人押走。此时不断有人跑入广场紧急报信，说明军队荷枪实弹扫射示威者，广场陷入惊恐。

凌晨1时，天安门以西约四公里的复兴门传出枪声，军队向堵塞他们的群众开枪，最少逾3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复兴门外医院接收大量死伤者。1时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发出《紧急通告》，内容说：

“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

中国官方资料称，《通告》内容广播后，至凌晨2时，几十万人的广场只剩下数千名学生和市民。凌晨2时20分，军队开进广场，施放催泪弹，部队从广场南面的前门向中央推

进，沿途向高空发射照明弹，群众向天安门广场北面后退。据报中枪者包括徒手阻拦军队的平民以及旁观的民众，也包括现场抢救的医务人员，另外有一队学生（包括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被军队坦克碾压，至少五人被压死，九人被压伤。[20]

根据陈希同的 1989 年 6 月 30 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报告，“暴乱”中有六千多军警伤亡，三千多名非军人受伤，二百余人死亡，包括 36 名大学生。他说“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人员等。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执行任务中受伤害的人员，政府要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

显然，中国官方的报道将军警伤亡的数字夸大，将学生和市民伤亡的数字大大缩小。根据综合报道，平民死亡的人数远远高于陈希同的数字。根据 T.布鲁克的《死亡调查》，仅就北京 13 家医院的统计，死亡人数在 6 月 3 日晚就达 479 人。[21]据透露，前国家主席杨尚昆曾经谈到“六·四”期间军队造成 600 多人死亡。[22]无论如何，“六·四”屠杀造成了上万人的伤亡。但是 20 年过去了，中国官方没有进一步的调查“六·四”事件，死亡人数也没有进一步的核实。即便按照中国政府的定性，政府也应当甄别哪些人是“暴徒”，哪些是误伤的市民并加以善后补偿。人民大学教授丁子霖 17 岁的儿子在所谓的“平息反革命暴乱”中被枪杀致死，至今政府对于她儿子的死没有一个正式的定性和赔偿。以丁子霖为领导的一些受难者妈妈组成了“天安门母亲”，要求中国政府调查“六·四”事件，要求政府让她们公开和不受干扰地悼念她们死去的亲人。这样一个简单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政府的答复，并且她们一直受到当局的骚扰和恫吓。

【注解】

[17] 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后简注“吴仁华”），第 48-50 页，真相出版社。

[18] 《“六·四”真相》，第 912-13 页。

[19] 吴仁华，第 34-35 页。

[20] 维基百科全书中文版，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5%9B%9B#_note-87。

[21] T·布鲁克，“死亡调查”，陈小雅《沉重的回首》，第 209 页，开放杂志社，2004 年。

[22] 参见，美国《世界日报》2008 年 6 月 4 日。（

三、“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是人民和平请愿运动

北京的学生在 1989 年 4 月走上街头，在“反官倒”“争自由”的号召下，获得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一个学潮在政府僵硬的态度下引发了一场广泛的爱国民主运动。人们称之为“爱国”，是因为学生们追求的是人民的自由和国家的富强。人们称之为“民主运动”指的是当时人们要求更多的自由和对政府进行的批评，甚至要求总理李鹏下台等。从整个运动的诉求和形式来看，这个爱国民主运动是一个大规模的人民和平请愿活动。

请愿就是公民对向政府机关提出各种诉求的活动。请愿往往通过言论自由或游行示威集会等自由权利来表达。在多数情况下，请愿的活动是承诺或愿意在现有宪法和法律的秩序内进行。“八九”民主运动正符合“请愿”的基本特点：人民行使宪法规定的自由权利，要求政府落实宪法，或称之为“行宪”。就运动的主流来看，人们没有提出超出宪法之外的要求。它是一个“维宪”运动，而不是一个“修宪”运动。它也没有提出“废除”宪法和推翻政府的主张，所以还谈不上是一场革命。

“反官倒”和争自由是运动的基本诉求

“八九”请愿的主要诉求是 4 月 17 日学生们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提出的“七条”。如前所述，这“七条”归纳起来就是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言论表达自由的要求和包括制定“阳光法”在内的“反官倒”即反腐败的要求。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当局在 4 月 25 日认定学生的请愿活动是“动乱”后，学生们加上了“摘掉动乱帽子”的内容。在当局决定在北京市区实行戒严后，请愿者提出了通过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罢免李鹏”和“取消戒严”的诉求。

请愿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以上所有的请愿要求都在中国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关于表达自由，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学生们所要求的是当局保证和落实这些自由。

关于人民的请愿权利，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关于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实行罢免权和监督权，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的实施，选举产生国务院总理并可以罢免之。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国务院的工作，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所以要求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罢免总理李鹏和取消戒严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当时请愿者还要求邓小平下台，这是要求在中国革除军事寡头政治。因为邓小平当时只是一个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是却实际操纵中国的政治，所以这个要求是合理的。

全国各界人士参与了请愿

“八九”民主运动已经超出了历史上一般的学潮，后期已经变成了各界人士参与的人民请愿运动。据研究报道，全国 300 多个城市发生了抗议示威活动，出现有数百个自治团体，近万人参加了长达一周的绝食，数千万人参加了各地的游行。[23]

这个运动的全民性首先表现为各界人士声援学生和直接参与（如北京成立的工人自治联合会）。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报道了北京连续几天百万人上街游行支持学生，要求中国当局与学生对话的活动，其中包括军人和警察。《北京青年报》1989 年 5 月 19 日第 1296 期发表的问卷显示，90%的答卷者认为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并且参加或支持了这个运动。其次，中共党内包括党的总书记在内的多数党员同情或支持学生。《中国妇女报》1989 年 5 月 19 日第 462 号报道了两个妇女党员的心声。她们说：“北京大学生绝食请愿，实在是万不得已。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但目前绝食已有六天，声援活动波及全国。这说明追求政治民主是民心所向，党心所向。”他们希望中共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去进行真诚的对话”。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也要求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政治纠纷。再次，市民们自觉和勇敢的站出来抵制军队参与戒严。他们的伤亡比学生的伤亡要大得多。

请愿是在和平的方式下进行

在“八九”请愿活动中，学生和市民们采取包括游行、集会和结社、对话、静坐和绝食的和平表达方式进行。绝食虽然将请愿活动带到一个激烈的高度，但那是以绝食者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人民的自由，这和当局用军队的自动枪和坦克来剥夺请愿者的生命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在请愿期间，请愿者和全国声援的人民没有通过暴力、暗杀、搞武装、政变、或其他非和平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八九”请愿运动坚持了和平原则。运动的主流没有要求政治制度的彻底变革

“八九”请愿活动没有提出颠覆宪法或在宪法之外重新建立一个政治制度的诉求。他们甚至没有将“选举”和“修宪”等民主改革作为主要诉求。在绝食最紧张的时候，请愿者提出的是“维护宪法”，在天安门广场成立的是“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在“4.27”大游行的时候，学生们打出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口号。这些都说明，请愿活动没有意图“否定中国共产党”。请愿者至多是要求共产党作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反对“官倒”和落实人民的自由权利。

当然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有少数人提出了超越学生们诉求之外的诉求，比如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彻底否定。典型的事件是 5 月 23 日来自毛泽东故乡湖南的余志坚，鲁德成和喻东岳等三人用颜色鸡蛋泼污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同时打出“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的横幅。但是 3 个当事人是广场上示威的学生们“扭送”到公安局的。当事人之一的余志坚说到：“我必须指出的是，没有八九学潮，我们是不会进京的；没有所谓戒严令的颁布，我们也是不会去砸毛像的。我们过去、现在都是中共的反对派，而在八九民运中，我们却是广场上的少数派，或者说激进派。”[24]这个少数派的观点在六四屠杀后变成了主流观点。

罢免国家领导人是人民改变政府的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宣告了人民通过选举治理国家的权利和人民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的原则。[25]中国宪法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2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其常务委员会有权选举和罢免包括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国家领导人其他国家工作人员。[27]这就是人民改变政府的权利。

在当局 1989 年 5 月 20 日宣布戒严后，北京和其他地区的游行队伍里出现了“召开人大”和“罢免李鹏”的口号，5 月 25 日，香港的文汇报刊登了 57 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议程包括罢免李鹏总理。要求罢免国家总理本是人民依照宪法改变政府的权利，由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在屠杀后却说这是“制造声势、煽动推翻政府”。[28]

当时最为激烈的声明是在戒严生效的当天（5 月 20 日）的《首都全体工人和学生的联合声明》。该声明说，“鉴于李鹏、杨尚昆等国家领导人仍然一意孤行，现在是联合起来，同全国人民一道通过法律程序罢免这几个暴君的时候了”。“为了讨伐和严惩这几个暴君”，学生和工人们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即召开临时大会，罢免国务总理李鹏，罢免国家主席杨尚昆，以及追究其他一切与人民为敌的现政府官员的法律责任。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组织特别法庭，依法公审这些暴君。” [29]

以上的言论不是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而是呼吁人民依据宪法改变政府。然而，当局则用这个声明作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定罪证据。这是逆世界民主潮流而动。

【注解】

[23] 封从德《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修订稿，转引自“未来中国网”<http://www.ccdtr.org/index.php/articles/3427>。

[24] 中国信息中心“观察”网，“余志坚：永远的反对派”，2008 年 2 月 23 日，<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47929>。

[25] 《世界人权宣言》第 23 条：(一)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

[26]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第二条，第三条。

[27]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第六十二条，六十三条，六十七条。

[28] 《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九日每日纪实》(香港注释本)，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后《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第 148 页：

香港《文汇报》上，刊登出 57 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议程包括罢免李鹏总理的新闻报导，制造声势，煽动推翻政府，造成严重后果。签名材料由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提供，并将 5 月 17 日、18 日、21 日三次建议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

的委员合在一起，通知了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刘锐绍。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为了「坚持下去」，又一次组织了非法游行。14 时许，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周围出现了游行队伍，但游行队伍比较松散，人数约为 2 万人左右，呼喊「召开人大」、「罢免李鹏」等口号。

[29] 见《“六·四”真相》第 553-54 页，《惊心动魄的 56 天》第 129-30 页。该文的全文由李进进起草，并由韩东方和郭海峰等签署，在广场通过绝食团的广播车播出的。声明的全文未见公开报道。李进进因此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认定为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免于起诉决定书“(90)京检分审第 348 号。

四、1989年春夏北京没有发生动乱

中国当局早在4月25日就将学生运动定为动乱。这个“动乱”的定性激化了政府和学生之间的矛盾。学生们最后以“绝食”来要求摘掉“动乱”的帽子。中国当局不妥协，坚持认定学潮是动乱并认为“动乱”发展成了所谓的“暴乱”。今天，这个“动乱”的帽子该去掉了。

传统的汉语词典里没有“动乱”一词的解释。“动乱”或“社会动乱”是现代的用法，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革命被称为“十年动乱”，成为人民对“动乱”理解的主要事例。在那十年里，中国发生了各派别之间的武斗，抢夺武器仓库，“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等被殴打、游街，国家法律全部无效，各级政权机构被夺权或陷入瘫痪，中国国家主席也被非法关押致死。1989年的中国没有发生这些事情，甚至连点迹象都没有。

4月15日到25日北京没有发生动乱

按照传统词典对“乱”的解释，“乱”是无秩序，那么，“动乱”应当是非常严重或极度的社会失序。1989年4月北京没有发生非常严重或极度社会失序的情况。中国当局是在“4.26社论”里将学潮定为动乱的。这个社论在1989年4月25日晚间播出。所以，我们要依据史料来判定中国的北京或其他地方在1989年4月25日之前的社会基本秩序是否遭到严重破坏。

从1989年4月15日到25日，这10天里，发生了一些游行示威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4.17”的学生游行和“4.18”在人民大会堂的静坐。这个静坐已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接受了“七条”后和平解散；“4.19”和“4.20”学生们在新华门前示威；“4.22”学生集体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旁听胡耀邦追悼大会；以及学生们“跪拜请愿”被拒绝后开始罢课。可是在这些活动中没有发生任何“暴力”或其他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的行为；北京市的治安没有因为这些示威活动而变恶化；北京市的各国家机关，工厂和事业单位的工作秩序没有受到实质性影响；北京市市民生活正常而有序地进行。甚至全国都在流传：北京学生请愿期间，小偷罢偷。事实证明，“动乱”是当局的谎言，是为接下来的武力镇压而找的借口。

4月22日和23日在西安和长沙分别发生了“骚乱”事件，有人烧毁汽车和抢砸商店等。但是这两起事件，参与的人数和范围都有限而且社会秩序立刻得到有效的控制。[30]其次，骚乱事件没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学生们也谴责之。[31]所以这两起事件是孤立的事件，扯不上“政治动乱”。

如此而言，“动乱”何在？邓小平最先将学潮定为“政治动乱”：“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32]《人民日报》的“4.26”社论就是根据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写成和发表的。事情很清楚，当局是以其“乱”背后的动机和思想倾向来决定“乱”的程度。这是以事件的政治倾向而不是以“乱”的程度或规模来决定其行为的法律性质和决定应对措施。

一个社会是否发生了动乱，不能依据其事件的政治倾向或行为者主观上的政治诉求来决定。首先，中国承认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国的宪法都确定了人民的表达自由。如果将和平的政治诉求作为确定动乱的标准，那就是否定人民言论和其他表达自由。其次，如

果以其行为的性质或者以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思想原则决定是否发生了动乱，那么等于“治乱”的法律措施目标是人们的思想。法律不能以人的思想来惩罚人，这是当代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确认的基本法律原则。中国领导人一边不得不承认这个原则，一边却违反这个规则，无时无刻控制人民的思想和惩罚他们不喜欢的有思想的人。这是中国 1989 年所谓的“动乱”的渊源。

游行示威和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本身不是动乱

有人会说，非法游行示威本身就是动乱。游行示威无论合法与否都是一种表达的行为。如果说乱是无秩序，动乱是非常严重或极度的社会失序，那么非法的行为不一定造成社会极度失序。北京学生们在 1989 年 4 月的游行无论是否非法都是有组织有秩序的。

有人会说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是动乱。首先，5 月 13 日开始的天安门广场绝食是在宣布“动乱”之后，其本身是要求摘掉“动乱帽子”的行为。其次，天安门广场就是人民政治表达的一个公共场合。学生们在那里进行绝食请愿活动，是行使宪法规定自由表达权利。姑且说是学生们“非法占领”广场，那至多只是违法或一般的“乱”，而非“动乱”。这是因为这个“乱”不影响当地人民群众正常的生活秩序。

北京城外和平抵抗戒严，城里生活和工作秩序井然

戒严后，北京的学生并没有撤离广场。可以说戒严并没有终止所谓的“动乱”。但是，这个“乱”没有影响北京人民的正常生活。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和生活秩序在北京学生占领广场下，不但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变好了。戒严后的第二天 5 月 21 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了如下采访：

街头一位推自行者的妇女对记者说，作为首都公民，我们能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完全能够维持秩序。

一位男子说，过去街上车碰着车就要吵架，现在能互相理解，招招手就走了。

一位五十来岁的男子说，我是外地出差来京的，从打戒严令发布之后，据我观察，街头交通秩序是好的，虽然人多，车也多，但秩序非常好，因为有学生在帮助警察维持秩序。

记者问一位售货员：“现在副食品供应还畅通吧”？售货员：“对，挺畅通的，而且也没有什么抢购。” [33]

《人民日报》关于戒严后的第二天报道说：

本报北京 5 月 22 日凌晨 4 时 50 分讯：国务院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生效业已 40 多小时。在政府划定的戒严区域内，仍未见到异于往日的发展情况。

21 日星期日，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首都和从外地来的大批大学生比肩静坐。东西长安街上，人流夜以继日；在不到百米的低空，数架军用直升机在往复掠过，不时撒下用大号印的李鹏总理讲话传单。引起阵阵骚动。

戒严令发出以后，广大市民担心执行戒严的解放军进城后发生流血事件，夜间在通向郊区的一些主要交通路口设置道路障碍。城市公共汽车、电车已中断两天。地铁停运。东西长安街等主要街道，群众自动维护交通秩序，指挥过往的各种车辆和行人。一些居民给本报打电话，抱怨看不到报纸，拿不到牛奶。入夜，在用各种大型车辆及其其他什物设起路障的许多交通路口，又聚集起黑压压的人群。[34]

《人民日报》5月26日报道：

“本报北京26日凌晨讯，昨天，北京烈日当空。下午起，东西长安街和广场周围的游行队伍一时不见头尾。从横幅来看，有来自科研、教育、卫生、新闻等单位及部分工厂的。也有不少是外地学生。长安街交通一度中断。北京各大小副食店和农贸市场，蔬菜肉蛋等生活必需品充足，货架、摊床琳琅满目。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全市工业系统的职工出勤率达到80%左右，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秩序基本稳定，中小学校书声朗朗”。

从以上的报道，我们看不到北京发生了任何社会动乱的迹象。如果有某种程度的骚动，那也是来自低飞的军用直升飞机和大军压近北京城造成的。

专制主义的惯性思维是“动乱”之源

当局为什么要将人民和平且有秩序的请愿示威活动看作动乱？问题出在他们的专制主义的惯性思维上。也就是说，他们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公开发表出来，不允许人们挑战他们的权威，将所有公开的表达，如游行示威等当作敌对的行为。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就是以他的方针和策略为思想、为中心。意见可以提，但是要以服从为前提，决定权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任何挑战他们的权威就是“乱”。

从这种专制主义的惯性思维出发，有些人就会将游行示威当作动乱，天安门广场就只能是显示“天子”权威的地方，而不能成为民意表达的地方。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将天安门广场也认为是个“海德”公园，那么，学生们在那里游行示威或绝食怎么会被认为是动乱呢？专制主义的惯性思维是当局认为八九学潮是动乱的思想根源。

专制主义惯性思维的另一个表现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以一家之法为天下之法。”所以当权者在“大私”和“大公”面前决不退让。这“私”就是“权力”和执政地位，这“公”则是民意。“六·四”屠杀后有人指责学生不退让所以导致了大屠杀。这种“不退让”之说故意或糊涂地不去追究为什么政府不退让。学生们“4.26”后主要的诉求是要求政府撤回“动乱说”。当时，包括中共的党员在内的千万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政府承认学生是爱国行为，去掉“动乱”的帽子。这是天下之声。但是，在这个“大私”“大公”面前，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绝无半点退让之意。他们害怕退半步就要退万步，就丢掉了他们的统治权力。所以，他们宁愿让他们的坦克往前推，也不愿意后退半步承认自己的错误。

在《人民日报》“4.26”社论公布后的当天，有人已经指出了中共当局不退让的“大私”所在：“你要民主吗？八七年初已有一位大人说过，拿几百万人头来换。或许今年的此时是付诸实施的时候了，保定的三八军怕是已经到了吧？[批注：四.二二进京，有六万人]”。[35]这张大字报不幸而言中了。其实，当时社会还没有推翻共产党的思想准备，中共统治集团根

本没有可能退万步。即便是以后退万步，又如何？如果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退出来又如何？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半点民主的思想，他们的举措才不断让学潮升级，最后不惜血腥镇压。

“一小撮论”、“阴谋论”和“外国反华势力操纵论”是挑起“动乱”的政治手段

为了达到政治控制的目的，当局通常将一个人民的运动或声音，说成是“一小撮人”操纵的。“4.26”社论就用了三个“极少数”。这是运用到至今的政治统治手段，也是一种很荒唐的思维。他们一边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中国是人民的共和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可是另一方面，经过“一小撮”论的推理，人民什么都不懂，人民变成了被“一小撮”人操纵的“阿斗”。

他们惯用的另外一个政治手段是对群众运动或反对派扣上“阴谋论”和“外国反华势力操纵论”。“4.26”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陈希同在“六·四”屠杀后报告中开宗明义就指出所谓的“动乱”是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势力“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长期战略的一个部分，是“在我国，党内党外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的结果。[36]这种“阴谋论”和“外国操纵论”同样是贬低人民判断力的说法。同时，历史经验告诉人们，“阴谋论”只不过是中共党内用来消灭异己的借口。在“新中国”的六十年里，中国人民经历了多少次重大的政治运动。“阴谋论”和“操纵论”不绝于耳，可是还有几桩被指控的“阴谋”到今天还成立的？关于“八九民运”的“阴谋”和“外国势力操纵”的指控，经过“六·四”后的审判和中共党内对赵紫阳的调查，当局没有提供任何让人信服的证据。

以上“三论”不仅是为镇压群众运动找借口，在运动的初期还会激化矛盾，挑起动乱。“4.26”社论后，学生们认为他们的爱国热情受到伤害，有的认为这是镇压的开始。有份大字报说：“不知是谁家喉舌的 CCTV 屏幕上，一个满脸正经的女人庄重地宣布中国出现了一次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也许是恫吓，也许是一场血腥镇压拉开了帷幕。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首都的几十万学生，教师和知识分子和上百万的工人、市民和干部参与和支持的爱国、爱人民的行动，以及他们最纯洁、最高尚的情感，被这个女人和她背后的某些大人物用‘动乱’这个邪恶的字眼粗暴地奸污了。”[37]于是学生们冲出封锁，举行了“4.27”大游行。同时，学生们要求和政府对话。学者研究的结论是，“‘四·二六社论’不仅没有对学运和知识分子起到弹压的作用，反而把胡耀邦追悼会后由于失去初始依据而势头渐弱的学运重新煽动起来。”[38]

【注解】

[30] 《人民日报》对于长沙骚乱的报道中说公安在武警的协助下“将 89 名不法分子和重大嫌疑人带离现场，很快控制了局面，恢复了正常秩序”，《人民日报》1989 年 4 月 24 日。

[31] 见《大公报》1989 年 4 月 24 日报道：“北京学生谴责暴乱行为”。

[32] 《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1978-2000，论 1989 年的政治风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中共党史学会，2001年6月，
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d/yd_m/yd_m_018.htm。

[33] 《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记者现场采访录”，1989年5月23日。

[34] 《人民日报》：“戒严第二天”，1989年5月22日。

[35] 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149页。

[36] 人民出版社，《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后注“陈希同报告”），1989年7月第一版。

[37] 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149页。

[38] 同上，第152页。

五、北京在 1989 年 6 月初没有发生“暴乱”

中国当局派军队血腥镇压 1989 年的人民请愿运动的理由是“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任何政治运动中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非理性的行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1976 年的天安门事件在行为的方式上一样有违法或“骚乱”的表象。但是，无论在世界近代史上或中国近现代史上用大规模的军队来镇压一个非暴力的群众运动是罕见的。中国当时是否发生了不得不靠军事镇压的“暴乱”是中国当局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一个最基本出发点。赵紫阳在 1997 年 9 月 12 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此讲道：“那次学潮不管存在什么偏激、错误和可指责之处，把它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没有根据的。既然不是反革命暴乱，就不应该采用武装镇压的手段去解决”。[39]作为当时中共中央第一把手的赵紫阳的这个判断，可以说是分析军事镇压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核心问题。

我们首先应对“暴乱”给出一个基本定义。“暴乱”不是一个确切的法律概念。经验告诉我们，“暴乱”通常包括群体性的“打、砸、抢、烧、杀”的行为。确定一个社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和地点发生了暴乱与否，关键在于如何确定暴乱行为的程度和严重性。1996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第二条规定：“在发生严重危及国家的统一、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安全的动乱、暴乱或者严重骚乱，不采取非常措施不足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紧急状态时，国家可以决定实行戒严。”以上对戒严的情况作了严格的限制，只有发生了“严重”的动乱，“暴乱，严重骚乱”并且不采取非常措施不足以平乱。参考 1996 年的戒严法关于导致戒严的动乱、暴乱、或骚乱的“严重性”、“紧急性”、和戒严的“必要性”的有关规定，导致直接军事镇压的暴乱一定有大规模的“打、砸、抢、烧、杀”等暴力或武力行为或事件发生；这种暴力已经导致了相当规模的人民生命的丧失并且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这种“暴力”行为必须是达到了一般的警力不能控制的程度以至于不得不采取有组织的大规模军事镇压。所以，“暴乱”不能包括一般的违法行为或小范围内和短时间的团伙性行为。暴乱不能包括“非武装”的群众性集会或游行。同时，如果军队介入“平暴”，在因果关系上，大规模的暴力行为是因，应当发生在镇压前，军事镇压是果，应当发生在暴乱后。如果发生了“反革命暴乱”，那么不仅那里发生了“打、砸、抢、烧、杀”的暴力行为，而且其行为指向夺取政权。

从官方的报道来看，所谓的“暴乱”是 6 月 3 日凌晨开始，邓小平等人决定对“天安门广场清场”是当日下午 4 时，当局用电视通告戒严部队强行进入北京是 6 月 3 日晚 6 时 30 分。也就是说，“暴乱”开始发生的时间应当在 6 月 3 日凌晨到晚上 6 时 30 分。如果在 6 月 3 日晚 6 时 30 分时以前北京没有发生任何暴乱，那么，军队“平暴”就是无稽之谈，就是屠杀。换句话说，发生在军队开枪以后的所谓“暴力”行为，只是对军事暴力的有限反抗。事实证明，“六·四”血案，军事暴力在先，有限的反抗在后。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表明中国当时没有发生暴乱，而只有屠杀。

当局所指控的“暴乱”完全没有证据

关于在“六·四”前发生了反革命暴乱的情况，官方报道来自于北京市市长陈希同 1989 年 6 月 30 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40]

在报告的第六节，陈希同指控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占领广场，“每日耗资 10 万余元，而且开始非法采购武器。”关于这一指控，除了陈希同的这个报告外，当局在镇压后没有提供任何进一步的证明，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动乱策划者被指控“非法采购武器”。这是明明白白的栽诬。

该报告的第七节，对“暴乱”作了专门报道，其标题就是“极少数人是怎样挑起反革命暴乱的”。陈希同说正是在下面描述的万分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按照他的说法，北京已经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首先，他指称，引发暴乱的一个事件是六月一日发生的一辆武警的吉普车因车祸轧死了一个人。他说，极少数人却有意把车祸同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城的行动联系起来，“大造谣言，说是戒严部队的开道车故意轧死学生，鼓动不明真相的人，要抢夺尸体，举行抬棺大游行。一时间，人心浮动，气氛紧张。经过这样的煽动和鼓噪，暴乱的火就被他们点了起来”。实际上，在人民日报第二天报导了车祸后，这个事件没有对参与学潮的学生和领导产生实际上的影响。至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北京市民或学生因车祸煽动闹事而被起诉。

按照陈希同的说法，暴乱开始于 6 月 3 日凌晨，“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就有人有组织地煽动一些人在建国门、南河沿、西单、木樨地等路口阻拦大小车辆，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曹各庄附近 12 辆军车被拦。从燕京饭店门前经过的战士被强行搜身。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轮胎被扎穿，并被隔离墩围住”。

这个报告中关于“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的说法，没有得到其他任何独立的资料印证。实际上当时的报道是，北京市民给军人送吃的，送喝的，以“人民子弟兵爱人民”的口号，劝说军人撤退。大量资料表明，北京市民没有武装拦截军车。和平的拦截军车根本谈不上为暴乱。即便有军车轮胎被扎，此种行为远远不能认作暴乱行为。这种行为只是证明了北京人民对解放军的不欢迎态度(对比 1949 年他们打开城门欢迎人民解放军形成鲜明的对照。)

陈希同对北京发生的“暴乱”更加荒谬的说法是，关于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们分发武器。他说：“[6 月 3 日]下午 5 时许，非法组织“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在天安门广场分发了菜刀、匕首、铁棍、铁链子和带尖的竹竿，声言“抓住军警就要往死里打”。“工自联”大广播中大肆叫嚣，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还有一伙暴徒纠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的围墙，抢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钢筋、砖块等，准备打巷战。他们的广播站不断播放如何制造和使用燃烧瓶、如何堵烧军车之类的“知识”，进行教唆和挑动。他们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砸、抢、烧，造成一个群众暴动的态势，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

陈希同的分发菜刀匕首等武器之说，他是当着全世界人民面前造谣撒谎。中国当局镇压后没有关于 21 个被通缉的学生运动领袖，比如王丹、吾尔开希、刘刚等，“黑手”王军涛和陈子明等，以及工自联的领导人韩东方和法律顾问李进进等这些人发放武器的镜头，照片，或任何文字的具体报道。更奇怪的是，镇压后被逮捕的高自联和工自联的领导人没有一个因为“发放武器”而以相关的罪名被起诉。当局也没有提供其他“动乱者”发放武器的具体的证据。根据当时广场“特别纠察队”队员回忆，包括那些特别纠察队员在内的学生们在清场的时候“依然是赤手空拳，手无寸铁”。[41]在 6 月 4 日凌晨军队在天安门血腥清场后，当

局没有任何报道说军队收缴了任何武器。退一步说，如果学生在 6 月 3 日晚上 7 时以后知道军队已经强行进入北京并且开枪了，那么他们发放任何武器都是自卫行为，是正义的反抗暴力的行为。

北京城里在所谓的“平暴”前没有发生“打、砸、抢、烧、杀”

如上所诉，暴乱的典型特征是在一定的地区和时间内对发生了大规模的“打、砸、抢、烧、杀”等暴力或武力行为或事件发生。北京市在 6 月 3 日凌晨到晚上军队强行进军北京之前没有发生这样的暴力行为。

陈希同的报告提到，“在拦截、砸抢军车的同时，一伙暴徒围堵和冲击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他们冲人民大会堂、冲中宣部、冲广播电视部，冲中南海的西门和南门。保卫这些机关的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数十人负伤。”陈希同没有说明这种冲击的方式，严重性，公安干警负伤的严重程度。当局在之后的审判中，没有人仅仅因为“冲人民大会堂、冲中宣部、冲广播电视部”而遭到起诉和审判。实际上，在五月以来就有些人在这些机构门前或附近进行和平抗议。他们没有武装，没有使用其他武器，那里也没有任何伤亡的报道。

与陈希同报告相反的报道是，北京市在平暴前秩序井然。如前所述，戒严后，市民们在城外进行有限的和平抵制。但是情况仍然不是那么严重，北京市民的正常生活没有受到影响，至多是交通暂时中断了两天，市民抱怨看不到报纸，拿不到牛奶。这远远谈不上有什么暴乱的迹象。《人民日报》对戒严的第六天的报道，工人照常上班，中小学生照常上课，书声朗朗，更是说明北京城内的生活秩序和治安良好。

以上就是“暴乱”前几天的情况。如此良好的社会秩序怎么会突然爆发了“暴乱”？唯一的解释是，军队要强行进入北京，北京市民反对。

当局在“平暴”后没有判决一个“平暴”前的“暴徒”

从 1989 年镇压后所揭示的资料表明，中国当时的决策者下定决心用军队强行占领天安门广场，用暴力解决国内的政治纷争的时候，北京没有发生暴乱。英勇的北京市民对当局用军队来解决非暴力的和平政治抗议进行了有限的抵抗。所谓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只是一个大开杀戒的借口。所谓的“暴徒”都出现在军队强行进入北京的过程中，而不是在之前。

当局“平暴”后的审判，判处了一批“暴徒”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法律是刑法第 100 条的“反革命破坏罪”。同时，军警还逮捕了一大批“暴徒”。可是，这些“暴徒”都是在北京城里烧军车或施行其他“暴力”行为的。军队不进城，谈何在城里烧军车。实施上，作为列宁称之为暴力的军队是先于“暴徒”施暴的。再说，这些“暴徒”多是北京市民，北京城是他们的家。作为暴力的军队，来自于外面。谁是正义之举，一目了然。

当局在“平暴”后没有判决任何学运的领袖或“黑手们”为“暴徒”或“组织暴乱”者

在“平暴”后的审判中，审判的所谓“暴徒”都是一般的平民或学生，学生领袖中除了郭海峰等少数几个外，几乎没有因为参与“暴力”而受审判。

镇压后，当局以“在北京煽动，组织反革命暴乱”的罪名通缉了 21 名学生领袖。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被逮捕和审判的学生领袖和王军涛、陈子明等“黑手们”没有一个因为“组织”或“实施”“反革命暴乱”而判刑。他们都是以刑法第 92 条的颠覆政府罪或第 102 条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决的。

当时适用的刑法中与“暴乱”直接相关的条款是第九十五条的“持械聚众叛乱罪”和第 100 条的“反革命破坏罪”。“持械聚众叛乱罪”最适用于通缉的“煽动，组织反革命暴乱者”。1984 年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在该条文下指出：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持械聚众叛乱。持械不仅指有枪炮等武器，而且包括刀斧、棍棒等各种凶器。聚众是指多人纠集一起，共同进行叛乱，单人不可能构成本罪。叛乱即公开暴乱，通常表现为杀人，放火，袭击党政机关，抢夺武器弹药、粮食、牲畜或其他财物等，往往在较大范围内造成严重破坏。在发生叛乱时，往往有一些不明真相的和被裹胁的群众参加，要把他们同反革命叛乱分子区别开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在这类案件中，着重打击的是首要分子、其他罪恶重大的和积极参加的分子。”

这里“持械聚众叛乱罪”要具备五个要素，第一，“持械”，第二，“聚众”，第三，发生了杀人放火等“叛乱”行为，第四，叛乱或“暴乱”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第五，惩处首要分子。

按照当局出兵的理由来看，被通缉的组织“暴乱”的王丹和王军涛等人，就应当以这个罪名被起诉和审判。但是被通缉的头号学生领袖王丹只是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 4 年。被视为“黑手”的陈子明和王军涛只是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控告和判刑 13 年。他们没有按照与组织或实施暴乱相关的反革命破坏罪或“持械聚众叛乱罪”受到指控和判决。[42]

另外被指控的工自联的主要领导，没有一个以“持械聚众叛乱”或“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工自联的主要领导人韩东方只是被控告“反革命煽动罪”而且被免于刑事起诉。有些“工人纠察队”队员以“反革命破坏罪”被判刑，但那是因为他们参与了抵抗军队的暴行，而不是在 6 月 3 日之前他们组织或实施“暴乱”。

中国当局没有指控和判定“八九”民主运动的领导人组织和实施暴乱，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当局事后的审判中根本拿不出证据来控告运动的领导者组织“暴乱”。上述事实证明，当时根本就没有发生所谓的“反革命暴乱”。

中共自己当时最高领导人也认为北京没有发生“暴乱”

被废黜的原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曾表示将学潮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没有根据的。[43]赵紫阳的上述观点对于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非常重要。首先，他是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掌握有大量的信息和内部通报。同时，客观的材料也支持赵紫阳的判断。要驳倒赵紫阳的判断，必须要用充分的史料。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可以驳倒他的判断的史料。

当局“平息反革命暴乱”后不久就不再或很少使用“暴乱”一词，而改称为“风波”。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 1989 年 6 月 30 日报告后，他们拿不出来更多的证据来

说明北京市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 7 时之前北京发生了“暴乱”。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陈希同的上述报告，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查不到全文。[44]很清楚，这里有《1984》一书中“老大哥”的作风，即陈希同后来被废黜和判刑后将他从历史上抹掉的意图，更有让人民遗忘这个“六·四”屠杀的企图。更重要的是这个报告经不起历史推敲。

【注解】

[39] 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后简注“宗凤鸣”），第 258 页，开放出版社，2007 年。

[40] 人民出版社，《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1989 年 7 月第一版

[41] 吴仁华，第 29 页。

[42] 唯一一个曾经以“持械聚众叛乱罪”起诉的是郭海峰，但是因为缺乏证据，该起诉书撤回。参见吴仁华，第 306-07 页。

[43] 见前注宗凤鸣，第 37 页。

[44] 在“百度”搜索网站上输入“陈希同制止动乱 1989 年报告”，找不到一个完整的报告。新华网，人民日报，和全国人大的网站没有该报告的条目。“新浪”网站上在可看到“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陈希同”的标题，但是打开网址后则出现“抱歉，你要访问的页面不存在或被删除”（http://blog.sina.com.cn/main_v5/ria/error.html）。

六、“六·四”屠杀的性质不容置疑

军队向非武装的群众开枪就是屠杀。中国军人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前夜和当天对非武装的北京市民开枪并用坦克车碾压平民而造成上千人的伤亡后，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有正义感的中共党员和军人和全世界的主要媒体，包括香港、台湾、和其他海外华人都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谓的“平息反革命暴乱”是对人民的屠杀。当时有人称军人屠杀了上万人。仅从死亡的人数来看，这个说法是夸大的。但是，历史不会因为实际死亡人数比最初发生屠杀时人们在愤怒之下报称的死亡人数少而改变其屠杀的性质。中国共产党政府纪念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就是纪念芝加哥警察镇压几十万请愿的工人，当时工人们首先扔了炸弹，所以“暴乱”发生在先。当时没有军队介入。警察开枪了，导致了 4 名工人的死亡。这个事件称之为“干草市场屠杀”事件。[45]按照中国政府给出的死亡人数，中国的军人在“六·四”枪杀了近三百平民，难道还不算是屠杀？

在世界历史上，不算种族屠杀或南京大屠杀那样的侵略性屠杀或内战，就政府镇压非武装的国内政治或社会示威游行，中国北京 1989 年的天安门大屠杀在造成死亡人数和其残忍的程度上达到世界之最。最接近中国天安门事件的是韩国 1980 的“光州事件”。运动的性质也是反独裁，要民主，也是学生主导，后市民加入。全斗焕政权也对光州市戒严，派出戒严部队，开出坦克。市民也是用公共汽车来阻挡军人。军队向学生和市民开枪，坦克向人群压过。那个事件从 5 月 18 日算起到 25 日共一周，据官方报道，光州事件造成了 191 人死亡，122 名重伤，730 名轻伤。[46]中国的戒严部队在 1989 年 6 月 3 日仅仅一个晚上，按照官方的报道，就造成了的 200 多人的死亡和数千人的伤亡。可见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如此缺乏人性。

军队镇压的对象是和平请愿者和非武装的市民

我们认定解放军的“平暴”是“屠杀”不仅仅基于军队的暴力造成了数以万计的伤亡数字，而且还基于镇压的性质和镇压的对象等情况。首先，军队镇压的是非武装的民众。其次，军队镇压的是请愿的学生和市民。如前所述，北京没有发生暴乱。那里发生的是得到多数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普通中国公民支持的人民请愿运动。人民的请愿活动是中国人民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难以避免的事件，本可以通过协商对话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立法和监督程序予以解决。可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军事政治寡头于人民的呼声不顾，动用军队来中断了这个和平和民主的进程。军队不合适地被拖入到国内和平的政治斗争中里，成为政治寡头镇压对立派的工具，1989 年的中国军人扮演了政治斗争工具的不光彩的角色。历史会记住这个耻辱。

当局用 20 万大军的规模和按照战役作战的部署镇压学生

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军队强行进军北京城区前，中央军委已经调集了 20 多万的全副武装的军人。它们包括北京军区的 24 集团军，27 集团军，28 集团军，38 集团军，63 集团军和 65 集团军等 6 个集团军，济南军区的 20 集团军，26 集团军，54 集团军和 67 集团军等 4 个集团军，沈阳军区的 39 集团军，40 集团军，64 集团军等 3 个集团军，南京的第 12 集团军。除此之外，空降 15 军，北京炮兵第 14 师，和北京卫戍区的第一和第三警卫师也参加了镇压。参与屠杀的总军人人数约在 20-25 万人之多。[47] 1948 年由邓小平任前委书记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解放军的总兵力才不过 60 万，人民解放军的对手是国民党的 80 万大军。[48] 1989 年的解放军却用了淮海战役三分之一强的总兵力，用坦克开道，用自动枪向人群扫射，用直升飞机在低空进行指挥，进军北京，可是对手却是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这不是屠杀是什么？

军队的暴行：残酷使用“开花弹”，刺刀挑进胸腹，坦克压过人群，子弹射向救护车和小学生

使用开花弹——中国军人在屠杀过程中还残酷地使用了国际公约都禁止使用对峙的“开花弹”。当时参与抢救工作的蒋彦永医生讲到 6 月 3 日的抢救情况：

“午夜后，部队已通过 301 门口，就不再有伤员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时，我就去手术室察看手术进行的情况。见有的人肝脏被打碎，肝内留有很多碎弹片，对此我们拍了照、录了像。其他一些手术中，医生们还发现伤员肠道内有大量碎的弹片，这和一般的子弹伤是明显不同的——是用一种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打伤的。” [49]关于开花弹的说法还有更多的证词。[50]

刺刀挑进胸腹——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受难学生的父母作证道：

“89 年 6 月 11 日我们在西单邮电医院见到了我儿子的遗体，我儿子浑身是血，尤其头部基本上是被血浆裹住了，脸部全是血，眼睛睁着，真是死不瞑目。再往下看：在肚脐下 7-8 公分旁有 5 公分左右一道伤口，显然是刺刀刺的，两手紧握，手心已被利刃割开，肩上、腰上有子弹击中的痕迹，脑后有弹孔，血就是从这四个伤口流出来的，真是惨不忍睹，我和老伴当时就昏了过去。” [51]

坦克向人群压过——一位学生的回忆：

“当我们来到六部口时，见马路左侧围满了一群人，坦克开始停下，并缓缓后退，我穿越马路，来到那里，当即被那个场面惊呆了。只见路边自行车道与马路结合处，方圆七米左右的地方，在被撞倒的数排自行车上面，是一大片血肉模糊的尸体。所有尸身连成一片，呈饼状，约有十多具，上面还有坦克履带印。一个小伙子脑袋被压扁，白色的脑浆迸出数米远，另一个戴眼镜的男学生，仰天躺着，下面的自行车把竟从他的后背穿入，从腹部穿出，还有一个女的，压得只剩下依稀可辨的蓝色裙子……在尸体旁，是一面红色的校旗，大部分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我从未目睹过这样残忍的场面（即便在电影中），这是对人性、对现代文明最无情的践踏；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悲惨、最黑暗的一页”！ [52]

方政的证词：

“89 年 6 月 3 日这一天，我一直在天安门广场，从这天夜晚戒严部队在北京市区开始大屠杀，直到 6 月 4 日凌晨，我们始终静坐在广场纪念碑周围，当时各高校学生约有四千人。‘六·四’凌晨 2 时许，从北京郊区冲杀过来的各路戒严部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周围，在坦克开道及军队驱赶下，静坐的学生大约从 4 时左右怀着悲愤、沉痛的心情和平、有序地从广场东南角撤离纪念碑周围，当时我走在队伍的后面。从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经前门西大街西行（在北京音乐厅附近一条南北走向连接前门西大街及西长安街的路），然后拐上西长安街继续向西

行。此时已近黎明，约 6 时左右，学生队伍靠西长安街左侧(南侧)行走 在人行道及自行车道上。当我们刚拐上西长安街行至六部口时，突然从人群背后射出许多毒气弹，顿时在学生队伍中炸开了，有一颗就在我身边爆炸，倾刻间，一团直径大约 2—3 米的浓烟笼罩了我们。走在我身边的一位女学生，在毒气熏呛下，加上惊吓，突然昏倒了，我便赶紧抱起这位站立不稳的女学生向路边转移。正在这时，我发现一辆坦克正快速由东向西朝学生队伍冲杀过来，于是我奋力将这位女学生推向人行道边的护栏。一眨眼，这时坦克已贴近人行道边逼近我的身边，坦克的大炮筒仿佛就在我的眼前。我躲闪不及，就势滚倒在地上，但是晚了；我的上半身被夹在坦克两条履带中间，两腿不幸被坦克碾压，履带上的链条绞着我的腿及裤子，将我拖出了很长一段路，我奋力挣脱出来滚到了路边，但这时我已经昏迷了。以后的事我后来才知道，我是被市民及学生送到积水坛医院去抢救的，在医院施行双腿截肢手术。我的右大腿上部三分之一处高位截肢，左腿膝下 5 公分处截肢”。[53]

向救护者开枪——一位志愿救护者的经历：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左右，一辆载有 20 多受伤的北京市民的领事救护车在长安街遭遇了东进的 38 军军人。他们下车后“取下插在车头、印有红十字的白旗，使劲摇晃着，向解放军戒严部队说明救护受伤者的目的。…因为支援救护者史鉴白上衣上绣有红十字的标记，所以，他勇敢地探出身子，向不远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大声呼喊：‘请你们不要开枪，我们是救护受伤者的’。…突然间，猛烈的枪声再次笼罩了车子，车厢前部分有人中弹倒下。车子里的自愿救护者震惊了！谁也没有想到在表明救护者的身份后竟然会再次受到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开枪射击，他们是抢救受伤者的职员救护者，而且还打着红十字的旗帜啊。[54]

向孩子们扫射——一位北京市民的回忆：

“六四大屠杀的第二天六月五日上午九点多钟，我从市中心王府井去远在永定路的部队医院看母亲。以往我都是骑车走长安街经复兴路一直就到了。六月四日戒严部队从南池子开始把长安街封锁了，我只得骑车绕道，走与长安街平行的前门大街。

……

目睹了这一幕，我骑车抱头鼠窜，经宣武门大街钻胡同想抄近路走。绕来绕去，绕到了闹市口中街，从这里能清楚看见长安街一线的戒严部队正在清理被烧毁的汽车路障。这时，刚才的一幕又发生了。从胡同里窜出几个孩子，冲着几十米开外的大兵高喊：“大兵，操你妈”！大兵端枪便打，枪声清脆，好像就从耳边擦过，可你看不见子弹，不知该往哪里躲，陷入极度恐惧之中，街里的过往行人都本能地往路边跑。我扔下自行车就地卧倒，当时每一秒钟都太漫长，浑身毛骨耸然，恨不得能有一个地缝让我钻进去。过了好一会儿，急促的枪声停止了。我抬头看一个孩子倒在了胡同口。别的孩子骂完一句都像土拨鼠似的返身钻进了胡同，这个孩子个子大一点，胆也大了点，他一句不解气骂了两句，第二句还没说完便中枪了。我到跟前看，这男孩顶多小学高年级，穿的大裤头（就是北京人爱穿的宽大短裤），鲜血像条有生命的小长虫从他大腿上窜了下来，顺着漆盖关节的弯转滑过小腿，迅速流向脚面。那孩子脸色煞白，没哭也没声。附近菜站一个大老爷们蹬了辆平板车过来，大伙儿把孩子抱到平板车上，孩子身体蜷缩成一团，平板车风风火火地驶走了。[55]

军队参加戒严和“平暴”无法理依据

军队参加戒严并向平民开火违背了军队的基本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九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宪法已经明确规定军队属于人民，主要职责是对外抵抗侵略。宪法在这里没有赋予军队参与国内或党内政治斗争解决人民政治请愿的职责，甚至都没有提到“维护社会秩序”或“制止动乱”的职责。

有人会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 1989 年 6 月 4 日是向戒严的抵抗者开枪，他们是为了协助戒严以恢复北京的正常秩序。首先这是假定，因为中国当局当时明确宣布军队强行进驻北京市是因为北京市从 6 月 3 日凌晨起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这就是说是，第一，这个公告排除了 6 月 3 日之前所谓的违法“动乱”活动是暴力活动，如示威或游行占领广场等。第二，军队是来“平暴”的，“暴乱”照理已经发生在先。这里中国当局公告的因果关系非常清楚。如果北京没有发生“暴乱”，那么就是军事镇压请愿运动在先，抵抗在后。如此，荷枪实弹的军人出现在北京首都的广场就师出无名。如果是师出无名，那么一定师出有因，这个因就是镇压和平请愿的人民。

即便如此，军队授权执行戒严命令的过程本身也缺乏合法性。中国当时没有戒严法。1996 年的《戒严法》对于军队介入戒严作了两条明确的限制性规定。一是“戒严任务由人民警察、人民武装警察执行；必要时，国务院可以向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派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协助执行戒严任务”（第八条）。二是“执行戒严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戒严指挥机构的统一部署下，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指定的军事机关实施指挥”（第十条）。这就是说，戒严是国内内政管理行为，非军事行为。部队的介入是基于国务院的要求，戒严军队要在政府的戒严指挥机构的统一部署下。

我们虽然不能用 1996 年的标准衡量中国军队在 1989 年参与戒严的法律问题，但是，1996 年的戒严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军队在戒严中的作用在 1989 年就已经存在。否则，1996 年的戒严法就是对 1989 年军队参加戒严并向平民开火的否定。当时国家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说“戒严是是为了协助首都武警、公安干警执行任务，绝对不是针对学生。”这就是承认了 96 年戒严法的基本原则。

大量的证据说明，中国 1989 年的中国军人来北京是来镇压国内政治上反对派或不同者政见者的。首先，一些军队，如第 38 军，在 4 月底就已经全副武装向北京开发。在“六·四”那天亲自目睹屠杀的原解放军 54 军 162 师下士的张世军说，他是在 1989 年 4 月 20 日就随部队进京。^[56]这说明，军队早在戒严前就准备镇压学生运动了，那时北京还没有实行戒严。第二，1989 年 5 月 19 日李鹏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的第二天，北京突然出现了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指挥部。”按理，戒严是政府管理行为，指挥部应由国务院和北京市的政府人员组成；军队是应邀参加。可是当时没有政府的戒严指挥部，军队的戒严指挥部取而代之。第三，即便当时军队介入有必要性，军队也没有必要全副武装并由坦克开道。北京当时没有任何非法武装或暴力事件。

【注解】

[45] 维基百科，“干草市场暴乱”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9%B2%E8%8D%89%E5%B8%82%E5%9C%BA%>

E6%9A%B4%E4%B9%B1&variant=zh-cn

[46] 维基百科,“光州事件”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89%E5%B7%9E%E4%BA%8B%E4%BB%B6&oldid=9242679>。

[47] 参见吴仁华第 262-68 页。据吴仁华透露,他即将出版的新书《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对于戒严部队的部署和暴行作了进一步准确地说明。本文关于戒严部队的规模和数字是根据上述两书的作者吴仁华提供根据新的资料修正的,比如在《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中提到了第 23 集团军现在没有列入进京名单中。

[48] 新华网,“淮海战役”,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9/22/content_1093543.htm。

[49] 蒋彦永:“关于为 89 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及其附件,“多维新闻网”

http://www5.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4_3_7_22_17_34_343.html assessed on 11-3-2004。

[50] 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IFCSS Newsletter Vol.5, No.9, June 1994。

[51] 吴定富,“悲痛 20 年”,“天安门母亲网站”

<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tiananmenmother/20%20years/m090404001.htm>。

[52] 钟罗白《白色黎明》,《世界周刊》1992 年 6 月 14 日。

[53] “方政的证词——‘六·四’伤残者”, 199 年 2 月 21 日,“天安门母亲网站”

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the%20truth%20and%20victims/Testimonies/testimony_25.htm。

[54] 吴仁华,第 181-82 页。

[55] 申雪(北京)“目睹戒严部队枪击少年”, 2004 年 05 月 25 日,转引自吴仁华,第 126 页。

[56] “‘六·四’戒严部队被除名战士给胡锦涛的公开信”/张世军,(博讯 2009 年 03 月 14 日发表)

http://news.boxun.com/cgi-bin/news/gb_display/print_version.cgi?art=/gb/china/2009/03&link=200903142150.shtml。

七、戒严是非法之举

1989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宣布对北京部分地区戒严。戒严令是以国务院的名义决定的，由总理李鹏签署发布。戒严的理由是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动乱。如前所述，戒严的理由本身不足，因为北京没有发生动乱。

国务院的戒严令的决定过程也不符合当时的法律。中国宪法规定，国务院可以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在这里，宪法规定的是“国务院”的职权，而不是总理的职权。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审计长和秘书长组成。虽然宪法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但是宪法同时规定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第四条规定“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必须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或者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这说明中国的总理不是西方分权理论下的行政首脑只对议会负责，在行政权范围内享有排他性的独断权力。中国宪法要求中国总理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于重大问题要经过集体讨论。这点被他们自己誉为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对中国的首都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无论如何都是法律规定中的“重大问题”，依法要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讨论决定。但是，1989年5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在颁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时候，没有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讨论决定。这一点，可以通过查阅1989年5月的《国务院公报》来证实。该月的公报没有国务院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开会的纪录。我们也没有看到有其它任何文献记载有国务院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开会讨论戒严的事项。可见，李鹏的决定只是他自己根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等几个人做出的，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人民对于这种非法之举当然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愿，要求废止之。

八、北京市“游行示威十条”越权无效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 1986 年 12 月 26 日通过并于次日颁布了《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这个规定共有十条，故简称“游行示威十条”或“十条”。有人用这“十条”来谴责参与 1989 年游行示威者，同时为军队镇压找借口。这是站不住脚的。

这“十条”的制定是在 1986 年底北京学潮高潮期间出台的，其内容是对宪法规定的人民的表达自由的限制，超越了宪法赋予地方人大的权限。“十条”中除了空头地讲“公民依法举行的游行、示威，本市各级人民政府予以保护”外，其它都是限制性的规定。其中的最大限制是无所不包的抽象条款：“违反宪法、法律规定，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换句话说，政府当局可以借口以上条款，否定任何游行的申请，而不予加以说明，也不受其他任何机关审查。它规定了申请制度，却没有规定复议制度。可见申请制度是单方面的，实际上“十条”只是授予政府有不批准的权力，没有给游行申请者对“不准游行”决定的复议权。换句话说，政府让你游行你就游行，不让你游行，你就不能游行。人民哪还有什么游行的自由。它还规定“人民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和首都机场的周围不许可游行、示威”。这是最荒唐的规定。这些地方是公共地方，更是人民实施表达自由的地方。这个限制没有任何法律的授权。可见，这“十条”走的多远。其他的限制不一而足。

“十条”本属越权无效。中国是单一制的国家，不是联邦制国家的分权体制。中国的立法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所有的法律渊源都来自全国人大。地方人大的法规只能是为执行法律而依据授权来制定的细则。国务院的法规在地方法规之上。故在中国的立法上，中央和地方只有原则和细则之分，没有立法权限的划分。地方人大无权直接制定出限制宪法规定的人民自由的地方性法规。中国宪法规定了人民游行示威的自由。到 1989 年 10 月为止，中国国家立法机关和国务院没有制定具体的法律和法规限制游行示威自由。所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十条”规定，超越了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直接限制宪法的规定，本属越权。越权无效，这是基本的法律原则。人们提出请愿取消这个规定，是中国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

“六·四”屠杀后，中国当局在几个月之内（1989 年 10 月 31 日）就制定了游行示威法。这说明，中国当局认识到了“十条”的越权的问题，实际上否定了“十条”。这个“十条”也在新的法律出台后作废了。因此我们不能以“十条”为标准指控北京学生和市民们的游行示威为非法，更不能以此为解放军的屠杀寻找理由。即便按照“十条”为标准说游行示威者为非法，那也不是解放军屠杀人民的理由。这是一个基本的道义底线。人民有“和平不服从”的权利。否则人民就不能够突破社会不公和政府对于人民自由的限制以及非法之法，社会正义就无法实现。我们也就无法理解过去的奴隶何以成为今天社会平等的一员。这是自然之法，正义之法。

九、历史的反思

从 1895 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的“公车上书”事件到 1989 年的以学生为先导的人民请愿运动，中国人民经历近百年的外患内乱。大小学潮也以百计。可是，无论从清朝政府、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和曹锟等北洋军阀政府，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他们都知道“镇压学生，千古罪人”。1926 年 3 月 18 日，段祺瑞政府的卫队开枪打死 40 余请愿的学生，作为军阀执政的段祺瑞立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身食素，以示忏悔。百年学潮中，只有 1989 年的学潮遭到共产党政府有计划有组织的屠杀。屠杀后，当局不但坚不下跪，甚至不让人们追悼死难者。这是中国人民的悲哀，共产党人的耻辱。

“六·四”屠杀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六·四”屠杀后，全世界除了极少数的国家外，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发出了谴责、忧虑或对屠杀表示遗憾的声音。世界各国民间抗议屠杀的声音响彻全球。

“六·四”屠杀后共产主义阵营也开始发生动摇。匈牙利政府国务部长波日高伊·一姆雷和外交部长霍尔恩·九洛指出：“北京事件非常令人遗憾，也向我们提出一个严重警告，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任何一个政权都不能使用这种手段，去巩固保守统治地位和独裁统治。”[57]这就是“六·四”屠杀在二十世纪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给世界人们带来的反思。

在这种反思中，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从柏林墙在 1989 年 11 月的倒塌开始崩溃。1989 年中国的爱国民主运动和中共当局后来的屠杀对这个进程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影响是，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中共的屠杀无寸铁的民众的讨伐声中，独裁者和军人们不敢冒世界人民之大不韪向抗议的民众开枪，而且那些觉醒的军人调转了枪头。当罗马尼亚的前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命令其国防部长向民众开枪的时候，他举枪自尽，而他的继承者反戈一击，将这个独裁者送上了人民的审判台。在那里，只有独裁者夫妇的脑袋落地，而没有千百万人头落地。

中共遮遮掩掩承认的教训

中国当局自己对“六·四”的屠杀也有些遮遮掩掩的反思。中共前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主播芭芭拉·沃尔特斯访问中在回答她的有关“六·四”镇压的问题时说：“我们应当从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训，正如中国一句谚语所说的‘吃一堑，长一智’”。他的传记作者写道：“江说在今后的事件中，将动用携带非致命武器的防暴警察来维持秩序”。[58]很明显，江泽民讲的“吃一堑”当然指的是军队的介入和开枪就是挫折和错误；“长一智”就是当局以后尽量不用全副武装的军队对付群众运动。这说明，中共当局自身否定了用军队镇压抗议民众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可是江泽民在正义面前吞吞吐吐，说了一半立刻打住，对芭芭拉补充说到“向在行动中牺牲的人民解放军表达（他的）敬意。”他还特别强调“我们怀念他们”。可是，被解放军开枪打死的那些百倍于死亡的战士的市民和学生呢？那些当初陈希同公开承认的被解放军“误伤”致死的人呢？江泽民对他们都没有提到，更别说表示点滴的同情或遗憾。这就是中共领导人的生命价值观。

学生们喊出了时代的声音

“六·四”屠杀后，有人别有用心地将“六·四”屠杀的责任推到学生们的身上。这是对屠杀者鞠躬。屠杀就是屠杀者的责任。学生们在请愿的策略上或许应当反思。但是任何反思离不开当时的历史环境。学生们走上街头的热情是社会生机活泼走向发展的必需。他们的声音是那个时代的人籁，也是一种天籁。人民在压抑之中，他们也要怒吼。全国各城市千百万人自发的上街支持和声援学生，是那个时代人民给予他们的肯定。当时很多人都说，“谢谢你们，大学生，你们讲出了多年压在我们心里的话。”历史还记载了这样的口号：“学生代表历史，学生代表人民”，“学生是中国的希望”，“后生教先生，先生赶后生生生不息”，“学生万岁，理解万岁”。[59]当年走上街头的学生喊出了那个时代的声音，那是人民对对腐败和独裁者的怒吼。

“六·四”的枪声摧毁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

如果说“八九”民主运动在“六·四”开枪前还只是反对共产党的“腐败”的话，那么“六·四”的枪声让大多数中国人清醒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制度开始怀疑和否定。共产党在镇压的枪声中开始失去了其统治的合法性。“六·四”屠杀后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的统治不是来自民意的选举或人们的认同，而是来自军队的镇压。在权威的管理和牺牲一大批人的利益和破坏环境的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在过去 20 年里得到了发展。但是，任何今天的经济发展不可以掩盖过去的罪恶。“六·四”的血不是也不应当是今天经济发展的代价。今后的经济发展也不能靠流血来支持。

“六·四”屠杀让执政的共产党背负着血债，执政党有了强烈的执政危机。他们知道，他们做不好就要下台或者再开枪。执政党希望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其统治的合法性。但是，人民需要全面地发展包括言论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生活。摆在人们面前的道理再清楚不过，只要一个政府的统治靠枪杆子来维护而不是靠人民的选票，其统治就不会有任何合法性，统治也将总是处于危机之中。

“六·四”屠杀后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受到进一步的压制

天安门屠杀 20 年过去了，中国人民在自由权利方面不仅没有得到任何进步，而且其条件比 1989 年还要倒退。中国的政治犯和思想犯在过去 20 年有增无减。到今天为止，它们还关押着非政府组织者胡佳和“08 宪章”的推动者刘晓波。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当局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起就大把花掉人民的血汗钱设置网络防火墙，设立网络警察配以其他传统的舆论控制手段来蒙住人民的眼睛，塞住人民的耳朵，堵住人们的嘴巴。在政治上聋哑的民族不可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信仰自由方面，不仅西藏人民受到了控制，内地人民一样遭到了限制甚至镇压或受到虐待，其中包括法轮功修炼者自 1999 年 7 月以来所遭受到的镇压和磨难。同时，中国当局违背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宣言，拒绝“政治异议分子”回国，将许多中国人变成了无国籍人。

“八九”请愿运动中提出的腐败问题越演越烈

20 年前人们提出的反官倒反腐败的请愿诉求，到今天不但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腐败大有

越演越烈的趋势。不论中国处置了多少高官，腐败在中国却得不到遏制。据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全球著名非营利性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简称 TI) 的报告, 2004 年中国清廉指数”在满 10 分的评分表中得 3.4 分, 与叙利亚和南非并列 71 名。腐败和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天然的孪生兄弟。目前, 在中国, 反腐败还只是共产党的纪律部门控制的事情, 人们的参与和监督是极为有限的。没有人民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 政府得不到有效的监督, 腐败就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所以, 我们还是要回到 20 年前学生们提出的请愿, 将反腐败和争自由联系在一起。

“镇压正当论”是无义之说

在“六·四”大屠杀后, 有人试图拿外国在历史上动用军队来解决“暴乱”或骚乱的事件为天安门大屠杀辩护和谴责 1989 年学生游行示威。最典型的说法是“象‘四二零’冲击中央政府办公处这种事, 若是发生在宪政民主的北洋时代, 段祺瑞政府是开了枪的。若是发生在彼得堡冬宫, 哥萨克也是开了枪的。如果是冲击美国白宫, 卫队也是开了枪的”。[60] 有人甚至说“一切真理都是宣传,” 呼吁共产党不要顾及“天安门”杀人, 大胆的宣传“杀人”的正义性, 通过宣传, 真理就出来了。提出这种主张的人还举例说, 别国的政府都这么干过。他说美国政府 1932 年也动用军队驱赶过“要求兑现补贴的退伍军人”(Bonus Army)。[61] 说此话的人还说过, 美国的军人在 1970 年还向学生开过枪。有的甚至拿 1863 年的“纽约征兵暴乱”事件[62]为“六·四”屠杀辩护。这是所谓“镇压正当论”。

这是一种不考究历史和违背历史事实的不负责任的说法。美国军人在 1932 年没有开枪。他们使用的是催泪弹, 只有两名儿童死于催泪弹。[63] 1970 年美国肯特大学枪杀学生案是国民军们自己判断失误的行为造成了 3 人死亡和 8 人受伤。[64] 政府当局没有命令和指挥开枪。纽约 1863 年的“征兵暴乱”, 首先是发生在美国内战的时候, 国家面临分裂; 其次, 暴乱者反对一个具体的国家法律即美国国会的征兵法; 骚乱中的铜头党们的确针对平民和政府机构“打、砸、抢、烧、杀”。美国军队是在这些事件发生后开始介入的。请问这些事件发生在中国的 1989 年吗? 1989 年中国学生们只是要求政府兑现宪法承诺的自由权利。北京的市民没有对平民或政府机构进行“打、砸、抢、烧、杀”。他们只是对用肉体阻挡军队的进程, 用公共汽车挡住坦克的路。两个事件没有可比性。按照“镇压正当论”的说法, 凡是反抗政府者就当诛。以此推论, 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都是暴乱。他们在世人面前不敢这样推论下去。可见“镇压正当论”者缺乏正义之心。

“镇压正当论”无视另外一个正义程序, 即西方国家发生如同“六·四”屠杀这样大的事情, 一定有个专门的调查机构, 向人民做个交待。当年美国“要求兑现补贴的退伍军”事件时任总统的胡佛在政治上受到批评。为了挽救影响, 国会拨款 10 万美元安排老兵回家。在总统竞选中, 胡佛当年就败给罗斯福。罗斯福上台后, 老兵又回到华盛顿。罗斯福总统仍然反对提前兑现老兵的退伍债券, 但是派出他的太太和他们谈判, 并且安排老兵到佛罗里达修建高速公路, 和解了老兵的诉求。[65] 1970 年俄亥俄州的肯特大学案, 联邦调查局和总统委员会专门做调查并得出结论说国民军开枪是错误的。此后在长达 8 年多的时间里, 受害者对上至州长下至开枪士兵的枪击案责任者, 进行一系列民事诉讼。1974 年, 联邦检察官也正式对开枪指挥官和士兵提出了刑事诉讼。[66] 反观中国, 政府不但不做调查, 连人民对遇难者的吊唁也受到限制和控制。

“镇压正当论”的比较方法本身是片面和强词夺理的。如果他们按照美国的法律标准来

衡量中国 1989 年的学生游行示威的行为，那么他们应当同样要用美国的法律标准来衡量中国政府的行为及其法律的制度和实施。在美国，任何人可以在白宫前对美国总统的图像扔鞋子。中国可以吗？美国的警察批准游行的程序简单和明了，而且出来保护之。如果警察否定了游行的申请，申请人还可以告到法院去，不一而足。在中国，人民的思想 and 自由几十年来都受到控制和压抑（文革游行也是为了毛而不是反毛）。中国政府对于反政府的游行是绝对禁止的。中国人民在 1989 年在冲击中国最后一个帝国——一个从思想到避孕都给管起来了的帝国。其中有非理性的行为是正常的。但是政府的反应比民众的非理性还要过头，最后变成了屠杀。我们应当站在哪个立场？是谴责民众的非理性，还是谴责暴君？

我们不能单方面地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的标准来衡量一个走向民主社会的民众抗议行为。因为政府掌握着国家的资源和军队等暴力机器，我们首先要追究政府的行为。那种一味追究抗议者的行为实际上是默认或支持一个独裁政府的为所欲为和歌颂暴力。这种思维不是糊涂就是献媚。“镇压正当论”是投机的说法。“镇压正当论”者在其他多数场合为了批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总是要谴责任何军警的野蛮行为的，更何况像天安门屠杀那样的行为。他们在这里只是为了辩护“六·四”屠杀而狡辩。但是，他们在正义面前无法解决“镇压正当论”的历史悖论，那就是，如果他们认为西方军队镇压平民是非正义的，那么别人非正义的行为（杀人）只能证明自己的非正义。一种非正义的行为不能为另一种同样的行为辩护。他们要证明 1989 年“六·四”镇压的合法性就得承认别国军队镇压平民也是合法的。可是，他们即便想这样做，也却羞于这样说，因为那是千夫所指的行为。

【注解】

[57] 维基百科，“六·四”事件。

[58] 参见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 146，169-70。

[59] 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 441 页。

[60] 参见：马悲鸣“八九民运与洛杉矶暴乱的异同”，<http://blog.dwnnews.com/?p=51452>。
又见杨非羊“给一个美国教授的答复”，“多维博客”<http://blog.dwnnews.com/?p=52114>。

[61] 李敖“一切真理都是宣传”，《李敖有话说》，中国友谊出版社，2005 年。

[62] 维基百科：“纽约征兵暴动”<http://zh.wikipedia.org/wiki/>。

[63] “ Bonus Army ” ,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Bonus_Army。

[64] 云儿“1970 年美国肯特大学枪杀学生案”，“多维博客”，<http://blog.dwnnews.com/?p=2460>。

[65] Britannica Encyclopedia, “Bonus Amy”。

[66] 同上云儿。

十、结论：没有结束的请愿和抗争

虽然从6月3日晚解放军在北京向平民开了第一枪始，就善恶已定，我们仍然要求中国政府负起责任，对“六·四”事件进行全面和公开的调查，并公诸于众，让那些死于屠杀之下的灵魂得以安息，让20年来社会和人们为此受到的创伤得以安抚。作为受难者家属的“天安门母亲”们，20年来在受到当局不断打压的情况下，不屈不挠地寻求正义，要求政府说出“六·四”屠杀的真相，提醒世人拒绝遗忘。他们提出了如下诉求：

（一）“六四”大屠杀是一场反人类的暴行，决非政府所说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因此，当年在邓小平主持下对“六四”事件所作的定性必须彻底推翻，并给予重新评价。

（二）“天安门母亲”认为，公正、合理地解决“六四”问题，必须满足如下三项要求，即：

- 1，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六四”事件进行独立、公正、公开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此次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及人数；
- 2，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对其亲部份天安门母亲属做出公开道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害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害者及受害亲属相应的赔偿；
- 3，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这是受难者家属的呼唤，也是全体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呼唤。我们认为，在“六四”屠杀二十周年的时候，当局必须公布现在已经掌握的死亡者名单、死亡时间和地点、死前救助情况。

除了受难者外，“六·四”屠杀后政府还逮捕、关押了一大批参与请愿活动的积极分子和抵抗或抗议“六·四”屠杀的平民，并将他们判处了死刑、无期徒刑或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我们要求中国当局必须立即释放所有与请愿和“六·四”屠杀有关的在押犯，赔偿受害者的所有损失。

同时，“六·四”屠杀后，还有许多参与者在其工作单位或就学的学校受到包括行政处分，开除等等各种不同的处分。政府应当对他们受到的各种不公道歉，并且补偿因此受到的损失。

以上的诉求不仅是为“六·四”受难者和被迫害者讨回一个公道，也是八九民主运动诉求的继续。20年来，中国当局不断的在镇压异议分子，关押政治犯，并向世界各国“输送”政治难民，其数量达到世界之最。中国政府还违反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拒绝自己的公民回到祖国。这种违反国际法的非人道的行为是对中国这个大国形象的侮辱。为此，我们呼吁，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允许政治难民回国。为了防止产生更多的政治犯和流放政治犯，我们要求废除因言定罪的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其他惩治人民思

想和言论的法律、法规；我们要求废除关于剥夺人民信仰自由、惩治所谓“邪教”的法律；我们同时要求取消限制和剥夺人民自由的“劳动教养”制度。为此，我们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67]使之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法律渊源。

为此，我们认为《零八宪章》提出的“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和“宪政”的基本理念符合全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中国走向自由和富强的不可或缺的基本价值观念，也是一九八九年爱国民主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我们要求当局放弃专制主义的惯性思维，停止用“动乱、暴乱说”、“一小撮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阴谋说”，和“外国势力操纵说”等指控来消灭异己和镇压人民的请愿活动。这种思维的结果如同 1989 年的“4.26”社论和“戒严”一样，只会激化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给国家带来难以抚平的创伤。这种专制主义的思维该放弃了，否则，中国就无以建立保障和管理现代社会的法治文明，宪法就是空话和骗局，公民社会就难以建立，人民仍然不能当家作主，民众的安全和福祉就不能免受来自暴政的侵害。这是我们的诉求，为此，**我们将继续抗争。**

鸣谢

本白皮书中的照片选自《争鸣杂志》、《亚洲周刊》、《星岛日报》、《星岛晚报》、《新闻周刊》、《K&W 图片社》、《美联社》、《六四档案》网 <http://www.64memo.com/flash/>，《天安门母亲》网站以及今枝弘一先生。上述新闻媒体及记者们，冒着危险真实地纪录了 1989 年天安门事件，历史不会忘记。由于出版仓促，未能一一致谢，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另外还要特别感谢纽约天安门基金会赞助本书的印制。 出版本书所有的收入将用于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和追查“六四”真相。

【注解】

[67] 1998 年 10 月 5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在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联合国制订的最重要的国际人权文书之一，1966 年 12 月 16 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开放供签署，1976 年 3 月 23 日生效，共有 53 条。政府签署的公约必须要得到国家立法机关的批准，国际法方可成为在国内具有约束力的法律。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1989年6月30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 陈希同

1989年春夏之交，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极其严峻的形势面前，党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为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动乱和暴乱，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主人翁责任感。现在，我受国务院委托，就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情况，主要是发生在北京的一些情况，以及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工作，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汇报。

一、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

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势力，总是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是他们长期的根本战略。这些年来，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和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更加紧了 this 战略的实施。在我国，党内党外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为在中国制造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正因为这样，在动乱的酝酿、预谋和发难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制造舆论、歪曲真相、造谣惑众等诸多手段的使用，都显示出了国内外、海内外相互策应、相互配合的鲜明特点。

这里着重讲一讲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情况。去年9月，党中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对这个决策和采取的各项措施是支持和拥护的。整个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势是基本稳定的。今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只两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李鹏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然，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对于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的分配不公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同时在推进民主、健全法制、深化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等方面，还提出了不少的要求和建议，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也是党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的确有极少数人紧密勾结，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正常的活动。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同志去年9月19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则呼吁赵成为“独裁者”。香港《解放》杂志也刊登长篇论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还说什么“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

去年末今年初，内外勾结进一步加紧，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比如，去年12月7日，由《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新观察》主编戈扬立即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今年1月28日，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的“都乐书屋”搞了一个所谓“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的除中国人之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100多人。方励之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现在需要行动”，“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2月初，方励之、陈军（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等人又在友谊宾馆举行了所谓的“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主要就所谓“民主”和“人权”两大问题发表了演讲，陈军把“五四运动”同“西单民主墙”作了类比。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民主而斗争。”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2月23日，台湾《联合报》发表《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的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2月26日，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李洪林（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包遵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戈扬等42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也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此后，北京一些大学陆续出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大小字报和集会。比如，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讨邓檄文告全民书》的大字报，胡说什么“共产党的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公然要求“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原则”。3月2日北京大学贴出题为《为中国人悲哀》的小字报，叫喊打倒“专制”和“独裁”。3月3日清华大学等院校出现署名“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写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鼓动“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3月29日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广为张贴方励之给香港《明报》写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彻底丧失了吸引力”，要组成政治上的“压力集团”，去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改革”。他所说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的代名词。4月6日北京大学贴出一份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

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提出了“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马列主义到底还适合不适合我国的国情”的问题。4月13日北京邮电学院等校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写的《告全国大学生书》，号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治’的大旗”，来纪念“五四”青年节。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所谓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仅北大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17场讲座，活动十分频繁。他们曾经把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的头头任峻町请去，围绕所谓“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散布了许多谬论。他们曾在塞万提斯像前举办讨论会，公开宣称“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他们还把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请去，充当他们的“军师”。李淑娴煽动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经常在这里集会”，“要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发生的动乱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香港《明报》载文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运动，已对学生产生极大影响，他们早已在酝酿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则犹如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总之，在极少数人的预谋、组织和策划下，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

二、学潮从一开始就被动乱的组织者所利用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使酝酿已久的学潮和动乱提前爆发。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表达了深切的哀思，各高校也为学生的悼念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极少数人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具有了政治动乱的性质。

这场动乱，首先表现在大量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传单和挽联等，对党和政府进行了肆意的攻击和诋毁，公然号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现政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一些大小字报，有的谩骂共产党是“一代奸党”，“是个即将溃灭之组织”；有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是“朽翁听政”、“独裁集权”；有的指名道姓地逐个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胡说什么“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有的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有的要求“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取消各团体、军队、学校、单位的党支部和政工干部”；有的发表《私有制宣言》，号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新的明天”；有的还提出要“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等等。许多大小字报用不堪入耳的语言，诬蔑邓小平同志，叫嚷“打倒邓小平”。

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动乱策划者们这个期间提出的纲领性口号，无论是通过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王丹在天安门广场首先提出的“九条要求”，还是后来提出的“七条”、“十条”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这两条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取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绝对自由。同这种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识界的所谓“精英”分子，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在此期间也组织种种座谈会，利用舆论阵地大肆宣传，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由戈扬主持，参加的有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锐绍（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等人。他们议论的中心也是两个，一是为胡耀邦“平反”，二是为反自由化“翻案”，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说什么由此“看到了中

国的前途和希望”。后来，当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正确决定之后，一贯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

这场动乱，还表现为在极少数人的挑唆和策划下，许多行为都是极其粗暴的，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是严重反民主反法制的。他们不顾宪法对“四大”的废除，不听劝阻，在校园内铺天盖地地张贴大字报；他们不顾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不经申请批准，连日不断地举行大游行；他们在4月18日和19日深夜接连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并且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他们违反天安门广场的管理规定，多次强行占据广场，4月22日那一天几乎造成胡耀邦同志追悼会无法正常进行；他们无视北京市的有关法规，不经登记就成立了“团结学生会”（后改名为“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并且向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夺权”；他们不顾法纪和校纪，抢占办公室，抢占广播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校园里造成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大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是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采用的另一个重要手法。学潮之初，他们就造谣说，“李鹏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骂胡耀邦，胡是被气死的”，诱导人们把矛头指向李鹏同志。事实上，那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是教育问题，当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正在就有关文件作说明时，胡耀邦同志突然心脏病暴发，立即就地进行抢救，缓解后被送进医院，根本没有什么生气的事。4月19日夜间，一位师大外语系的女学生在参加晚会后回校途中，被无轨电车撞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有人就造谣说：“共产党的军警开车轧死了学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情绪激动。4月20日凌晨，我公安干警将冲击、围堵新华门的学生强行带离现场，用公共汽车送到北京大学，又有人造出了所谓“4·20血案”的谣言，说什么“警察在新华门打人，不光打学生，还打了工人、女人和小孩”，“一千多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搞得一些人的情绪更加激愤。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结束，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离开人民大会堂之后，有的人为了制造攻击李鹏同志的口实，又精心策划了一场骗局。他们先是造谣说“李鹏总理答应12点45分出来接见广场上的同学”，接着就由3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台阶上跪递“请愿书”，然后又宣称“李鹏临时变卦，拒不接见，欺骗学生”，煽动起广场上数万学生的强烈不满，几乎造成冲击人民大会堂的严重事件。由于这些谣言的蛊惑和挑唆，大大激化了青年学生同政府的对立情绪。极少数人就利用这种情绪，提出了“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造成北京6万高校学生罢课的严重局面，许多外地高校也相继罢课，使学潮升级，动乱扩大。

这场动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已经不局限于高等学校，也不局限于北京地区而是向着全社会和全国各地扩散。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一些人到中学、工厂、商店、农村串联，上街演讲，散发传单，贴标语，搞募捐，千方百计扩大事态。有的中学出现了“罢课罢考万岁”的大字报，有的工厂贴出了“联合工农，打倒暴政”的传单。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提出了“南下北上，东来西走”的口号，企图发动全国性的大串联。南京、武汉、西安、长沙、上海、哈尔滨等地的高校都发现从北京去的学生，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学生也到北京参加游行。在长沙、西安等地，发生了严重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活动。

这场动乱一开始就有海外、国外各种政治势力插手。国民党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

参加学潮的学生注意“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群体进行有效的活动”，“应把彻底否定 1987 年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介的联系”，“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中国民主联盟”的两个头头王炳章和汤光中还急急忙忙从纽约飞往东京，企图闯回北京，直接插手这场动乱。一些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特邀方励之领衔，从哥伦比亚大学发回了《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人民必须拥有对执政党的选择权”，煽动人们推翻共产党。一个化名“红岩”的人从美国用传真电话发回“修改宪法的十条意见”，提出全国和各级人大代表以及各级法院的法官，都应“由无党派候选人中选举产生”，企图把共产党从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中彻底排除出去。一批身居美国的原“中国之春”成员，匆匆忙忙地组成了“中国民主党”，向北京一些大学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煽动学生“要求保守派的官僚们下台”，“促使中共结束其专制统治”。港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反动政治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手段，纷纷介入。一些西方通讯社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心，特别是“美国之音”，每天用三种节目，花十多个小时，向中国大陆进行喋喋不休的报道，造谣惑众，煽风点火，为这场动乱推波助澜。

以上大量事实说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潮，而是抱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背离了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运用卑劣的政治手段，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挑起的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如果不是这样从本质上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就会在斗争中陷于极大的被动。

三、《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对动乱的定性是正确的

从 4 月 15 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 4 月 22 日治丧结束，赵紫阳同志对悼念活动期间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在他 4 月 23 日出访朝鲜前开一次会，但他不仅拒不接受，反而若无其事地打高尔夫球去了。由于他采取这样的态度，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4 月 24 日下午，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万里同志作了汇报。在万里同志的建议下，当天晚上由李鹏同志主持，政治局常委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会议一致认为，当时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同时要求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力争尽快平息动乱，稳定局势。次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认识，增强了大家平息动乱、稳定大局的信心和勇气。《人民日报》4 月 26 日的社论，体现了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指明了动乱的性质。同时，明确地把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同广大青年学生区别了开来。社论的发表，使绝大多数干部感到心里有了底，行动有了方向，可以旗帜鲜明地开展工作了。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接连召开党内外各种会议，坚持原则，统一认识；运用各种形式澄清谣言，安定人心；支持学校领导、党团员和学生骨干大胆工作，对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进行劝阻和疏导；积极开展各种对话活动，努力争取群众。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同志同学生的对话，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同学生的对话，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同学生的对话，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认真做好工厂、农村、商店、中小学和街道的工作，稳住大局，防止动乱向社会蔓延。各省、市、自治区也按照社论精神，抓紧做好本地区的工作，防止北京事态的影响向外地扩散。

由于4月26日社论旗帜鲜明，使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被迫在策略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社论发表前，大量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发表后，4月26日，非法组织北京“高自联”就发出了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要求4月27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规定的口号包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等，并且在方励之的授意下，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的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等各界群众赞同的口号。日本时事社这时从北京发出一则题为《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集团》的报道，把所谓“赵紫阳智囊团”里的一些人物称之为“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年轻官员”，说他们“频繁地接触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参加游行的北京市内的各大学的新自治会代表，给学生们出主意”，在27日的大游行中，学生们举着“‘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等标语，这也是遵照了这个集团的指示”。学潮的头头们原来打算要“百日游行，无限期罢课”，社论发表后，这个劲头没有了。5月4日同4月27日的游行相比，学生人数由3万多人减少到不足2万人，围观的群众也大为减少。“五四”游行之后，经过各高校党政领导做工作，80%的学生都复了课。全国各地在《人民日报》“4·26”社论发表后，局势也迅速趋向平稳。显然，再做一些工作，这场由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引起的动乱就有可能得到平息。大量事实说明，《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它的确起到了稳定首都、安定全国的作用。

四、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

在动乱接近平息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采取了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态度。本来，在他出访朝鲜期间，政治局常委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就打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4月30日回国之后，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还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4月26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认为前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没过几天，他却在5月4日下午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决定、邓小平同志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第一，在已经出现明显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经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利用学潮策动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鲍彤还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当天下午就立即广播，并且要连播3天；又要求《人民日报》次日在头版显着地位发表，同时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而对不同的意见不仅扣住不发，甚至不许在内部参考读物上发表。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经过《人民日报》及某些报纸的大肆渲染，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动乱的组

织者和策划者撑了腰，壮了胆，打了气。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同中央的方针截然不同，这一点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议论，连国外的舆论都看得清清楚楚。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说，赵的讲话“与一周前对学生们的严厉谴责形成了鲜明对照”，是对“上周的判断的一大修改”。法国《世界报》5月6日也载文指出，“这位党的首脑（指赵紫阳）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的发展变得对他有利了”。这篇讲话抛出之后，各级领导干部、党团员和群众中的骨干，尤其是高校的同志，思想上感到迷惑不解，工作上感到无所适从，许多人都表示反对。有的人说：“中央出了两个声音，谁对谁错，以谁为准？”有的说：“要我们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哪个中央保持一致？”有的说：“紫阳在上边当好人，我们在下边当恶人。”学校干部和学生骨干普遍认为“被出卖了”，心情十分沉重，有的伤心得流下了眼泪，学校工作完全陷于被动。当时，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处境非常困难，明知道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对下还要违心地说是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侧重点不同”。许多事情需要向中央请示，而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迟迟不召开会议。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强烈要求下，5月8日勉强开了一次会，但根本不听北京市的汇报。会上有的同志反映，赵紫阳同志5月4日的谈话与4月26日的社论精神不一致，他声色俱厉地说：“我讲错了，我负责任。”在另一次会上，有的同志反映，第一线工作的同志都说“被出卖了”，赵紫阳同志生气地责问：“谁把你们出卖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卖。”当时，上上下下有不少人同港台报纸相呼应，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等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连游行的痞子也高呼口号：“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罪责难逃。”大家眼看着事态越来越恶化，有些措施想办也办不了。

同上述情况相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却从赵紫阳同志的谈话中受到了鼓舞。严家其、曹思源（四通公司发展研究所所长）等人说：“现在出现了转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张显扬说：“不是说要利用学生吗，赵紫阳现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在赵紫阳同志的鼓动和少数人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自治会”的头头当晚就重新宣布罢课，许多学校也相继宣布继续罢课，并且组织了“纠察队”，禁止愿意复课的学生去教室上课。接着，游行示威的浪潮又重新掀起。5月9日，30多家新闻单位的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递交请愿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师范大学、政法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上万名学生又上了街，示威游行，声援记者，散发传单，鼓动罢课绝食。从此，事态骤然逆转，动乱重新走向高潮。在北京的影响下，外地已经平稳下来的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赵紫阳同志讲话之后不久，5月9日、10日，山西太原就发生了大批游行示威的学生冲击省委、省政府，冲击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and 民间艺术节的事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五、以绝食相要挟，使动乱更加扩大

善良的人们提出，学生闹得这么凶，是不是政府对他们理解不够，体谅不够，让步不够？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从动乱一开始，党和政府就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之心，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提出的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惩治官倒、消除腐败的要求同党和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并且希望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正常程序解决问题。但是，这种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政府提出，希望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对话，来沟通思想，增进理解，而非法学生组织却对对话条件提出了很高的价码。他们要求，对话的对象“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人员”，每次对话“必须出具联合公告，由双方共同签字”，对话要由“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地点轮流举行”。这哪里是什么对话，完全是摆出一副要同党和政府进行政治谈判的架势。特别是赵紫阳同志的“五四”讲话以后，极少数人更是利用这一时机，把党和政府的克制视为软弱可欺，要价

更高，条件更苛刻，使动乱不断加温，步步升级。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仍然采取了十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希望继续保持对话的渠道，以利于教育群众和争取多数。5月13日凌晨2时，“高自联”的头头提出了对话的要求，凌晨4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答复同意，但天明之后，他们又自食其言，取消了这次对话。5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信访局再次通知他们，决定于15日同学生进行对话。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在参加人数上大作文章，先是提出了一个20人的名单，政府同意后，又要求增至200人，还没有等到充分商量，就指责“政府对话毫无诚意”，在接到对话通知仅4小时之后，就急急忙忙抛出早已准备好的《绝食宣言》，发动了一场历时7天、前后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绝食，从此长期占据了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头头王丹说，选在13日开始绝食，“正好可以借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把绝食学生当“人质”，以他们的生命为赌注，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要挟政府，使动乱更加严重。

在学生绝食过程中，党和政府继续保持了极其克制的态度，竭尽全力，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是学校工作人员、各级领导干部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对他们进行思想疏导。其次是协助红十字会，先后调配了100多辆救护车，抽调了数百名医护人员，昼夜守护在绝食现场，并动员52家医院腾出近2000张病床，保证因绝食休克或致病的学生及时得到救护和治疗。三是提供各种物资，尽可能减少绝食学生的痛苦和保障他们的安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抽调干部、工人和车辆，通过红十字会，昼夜为绝食学生运送饮水，提供食盐和食糖；环卫局调出了洒水车，配备了脸盆、毛巾，供绝食学生洗漱；医药公司调来充足的防中暑、防感冒、防腹泻剂，交由红十字会分发；食品部门运来大量饮料、面包等，以备紧急抢救学生时使用；商业部门调运了6000顶草帽，北京军区应北京市要求送来1000条棉被，供绝食学生白天避暑，晚上御寒；为保持绝食现场的卫生，搭起了临时冲洗厕所，环卫工人还趁深夜进行了绝食现场的大清扫；18日大雨前，又从公共交通总公司抽调78辆大客车，从物资局调来400多块厚木板，供绝食学生避雨、隔潮。在长达7天的绝食期间，没有发生一起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的事件。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反响。事实一再教育人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是执意同我们作对到底的，容忍一千遍，退让一万步，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不仅没有做他应当做的工作，反而煽动新闻界，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把已经恶化的局面搞得更加难以收拾。5月6日，赵紫阳同志对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的胡启立、芮杏文同志说，对学潮的报道“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在这里，他竟把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称之为“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他的这番指示，当天就向首都主要新闻单位作了传达，随后又作了多次部署。这样，《人民日报》等许多中央报刊便对游行、静坐、绝食等采取了充分肯定、积极支持的态度，进行了连篇累牍甚至言过其实的报道，连香港报纸也对这种奇特的现象表示惊讶。

在舆论的错误引导下，从5月15日开始，上街游行声援学生的群众一天比一天多，声势一天比一天大，从几万人、十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全国各地还有20多万学生赶来声援。一时间，似乎不参加游行就是“不爱国”，不表示声援就是“不关心学生的死活”。在这种情况下，绝食的学生骑虎难下，欲罢不能。许多教师和学生家长给领导机关和新闻单位写信、打电话，要求报社、电台、电视台不要把绝食的学生逼上死路，要求发发善心，救救孩

子，停止这种“杀人舆论”，但没有得到什么效果。由于学生绝食和市民游行，首都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受到严重干扰，一些活动日程被变更，有的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的人数急剧增加，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波及面如此之广，骚扰如此之严重，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

为了给学生撑腰打气，给动乱火上浇油，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精英”，纷纷赤膊上阵，走上前台。5月13日晚，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无法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5月14日，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光明日报》记者）、于浩成（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讲师）、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刘再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等12人又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说如果不能实现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这些人还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进行煽动，诬蔑我们的政府是“无能的政府”，说什么由学生绝食“看到了中国的光辉前程”。接着，又组成了非法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发表了《5·16声明》，倒打一耙地威胁说，政府如果不接受极少数人的政治要求，“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

在事态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利用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斗争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在会见时，一开头就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第二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就发表了极其猖狂恶毒的《5·17宣言》。他们咒骂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他们毫无掩饰地说，“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对于这种极其反动的叫嚣，港台的一些报刊也遥相呼应。香港的《快报》于5月18日发表《倒邓倒李不倒赵》的文章，说什么“赵紫阳的讲话充满暗示，现时国内的乌烟瘴气，全因邓小平掌舵而起”，“现今群情汹涌要倒邓倒李，而赵紫阳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还说，“倘若倒邓成功，而中国的改革确能走上开明法治之途和实现民主，对香港来说，是一则喜讯”。在这一派呼啸声中，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有的要求“邓小平滚下台”，有的提出“李鹏下台，谢国安民”。在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动乱策划者们企图借混乱之机，乱中夺权。他们散发传单，宣称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要取代市人民代表大会，并鼓吹成立“北京区政府”，取代合法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他们攻击依法选举产生的国务院是“伪政府”，造谣说已有外交部等十几个部“宣布独立”，脱离国务院，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同我国断交。他们还造谣说，“邓小平已下台”，于是就有人抬着棺材游行，烧毁邓小平同志的模拟像，在天安门广场燃放鞭炮庆祝他们的“胜利”。

首都的局势越来越严重，无政府主义恶性泛滥，许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如果还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那么，就会再度严重贻误时机，进一步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会允许的。

六、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正确措施

为了保证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89 条第 16 项授予的权力，国务院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也是果断的、正确的决策。

5 月 19 日，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赵紫阳同志顽固坚持同中央正确决策相对立的错误立场，既不同意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也不同意主持大会，甚至连出席一下大会都不同意，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于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在这之前，5 月 17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当天就泄露了戒严的机密。一名在赵紫阳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对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说，现在军队要“镇压”你们，别人都同意，就是赵紫阳反对，你们要做好准备。17 日晚，鲍彤召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员，在泄露了即将戒严的机密之后，发表了“告别演说”，警告与会者不得把会上密谋策划的情况透露给别人，否则就是“叛徒”，就是“犹大”。5 月 19 日，就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长高山，赶到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开会的人传达了所谓“上边”的指示。随后由陈一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主持，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 4 家的名义，起草了《关于时局的 6 点声明》，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广播，并广为散发。《声明》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并且授意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要尽快结束绝食”，暗示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军管）”。接着，自称来自“体改委”的一些人窜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说什么“怀着极为悲痛极为愤慨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已经被罢免”，呼吁全国罢工、罢课、罢市，煽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决死的斗争”。这个演讲，很快就被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广为散发。当晚，在北京站广场等公共场所还发现题为《关于学运策略的几点建议》的传单，指示“目前绝食对话已不是我们的手段和要求，应当改为和平静坐，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号，即：（一）紫阳同志不能走；（二）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三）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还说“对军队的到来不应采取惶惶不安、如惊弓之鸟的态度”，“这种对待军队的态度及方式，要在他们到来之前反复向同学们解释宣传”。最近一些已经被逮捕归案的“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也交代，5 月 19 日下午 4 时许，有人自称中央某机关工作人员，拿着条子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透露了即将实行戒严的消息。正是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同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紧密结合，使他们得以及时调整策略，在当天晚上抢在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之前 45 分钟宣布把绝食变成静坐，造成既然学生已经停止绝食政府就没有必要戒严的假象，以迷惑群众；得以及时组织力量，裹胁不明真象的人，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堵截军车；得以继续组织舆论，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他们一面恶毒咒骂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什么“我们不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一方面大肆吹捧赵紫阳同志，说什么“党无紫阳，国无指望”，呼唤“还我紫阳”。他们还阴谋集结力量，搞更大的动乱，宣称要动员 20 万人占领天安门，要在 5 月 20 日组织全市性的总罢工，并且同 19 日赵紫阳同志称病请假 3 天相配合，扬言 3 天之后就要成立“新政府”。

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断然决定于 20 日上午 10 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防止事态更加恶化，掌握制止动乱的主动权，给广大反对动乱、渴求安定的人民群众撑腰。但是，由于我们的决策事先被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所掌握，部队进城仍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阻挠。戒严的前夕和戒严后的头两天，所有的主要交通路口都被堵塞，220 多辆公共汽车被劫持，当作路障，交通陷于瘫痪，各路戒严部队不能及时按计划进入指定地点。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驻地继续被围堵，街头煽动的演讲随处可见，制造谣言的传单比比皆是，数万人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首都北京处于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随后几天，戒严部队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广大武警、公安干警排除万难坚持执勤，各城区和近郊区把工人、市民、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建立了约 12 万人的首都群众维持秩序工作队，各远郊县也出动了民兵，依靠军、警、民的协同努力，使首都交通运输和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有所好转，人心逐渐趋于安定。但是，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目标丝毫也没有改变，事态正在一天一天地向着反革命暴乱的方向发展。

戒严之后，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不走。他们要把广场作为所谓“学运乃至全民族的一个中枢”，一旦政府作出什么决定，就准备在广场上“作出强烈的反应”，“组成一个反政府的统一战线”。他们早就策划在广场挑起流血事件，认为“只要不撤离广场，政府就会进行镇压”，“鲜血可以促使人民觉醒，使政府分化瓦解”。为了支撑广场的局面，他们依靠海内外反动势力提供的资金，不断改善设施，装备先进的通讯工具，每日耗资 10 万余元，而且开始非法采购武器。他们依靠香港声援团提供的帐篷，在广场建立了所谓“自由村”，开办了所谓“民主大学”，声称要使它成为“新时代的黄埔军校”。他们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了一个什么女神像，原来叫“自由女神”，后来又改名为“民主之神”，把美国的民主、自由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刘晓波等幕后策划者担心静坐请愿的学生难以坚持，就亲自走到前台，搞了一个 4 人参加的 48 小时至 72 小时的绝食闹剧，为青年学生加油打气。他们说：“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坚持斗争，辐射全国，直到政府垮台。”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部队在戒严之后仍然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组织各种非法活动。他们继“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之后，又相继建立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他们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名义，明目张胆地打电报给一些部队，挑拨离间，进行策反。他们组织专门的舆论班子，筹办地下报纸，从事颠覆政府的地下活动。他们结成死党，集体进行地下宣誓，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皇帝称臣”。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高自联”的部分头头开会，提出了退出天安门广场的 6 个条件，即“军队回去，戒严取消，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退休，赵紫阳复出”，并且准备组织所谓“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特别严重的是，他们认为赵紫阳同志请病假离开总书记的岗位之后，从党内解决问题的希望已经渺茫，转而寄希望于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严家其、包遵信等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说什么“目前宪法受到少数人的粗暴践踏，我们紧急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在某位人大常委委员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出《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征询意见函，征集了部分人大常委的签名，并且向外地部分人大常委发了加急电报。他们采取阴谋手段，向一些人大常委发函、发电时，只讲建议开会，而不讲他们真正的主张，企图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甚至盗用他们的名义，强加于人，以售其奸。在办了这些事情之后，严家其、包遵信就在香港的《明报》上，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

的问题——兼告李鹏书》，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肆无忌惮地挑动和组织暴力行动。他们纠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窜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网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凑所谓“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扬言要软禁、绑架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他们散发煽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传单，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组织“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它的政府”。他们扬言，“秋后算账，非算不可”，要算党的帐，算政府的帐，并且准备了要镇压的干部名单。香港《明报》还刊登了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之一的刘晓波6月2日同一个所谓“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公然叫嚷“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

动乱策动者的种种活动，都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除四通公司等单位给予几十万元的物质支持外，还得到海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的财力物力支持。美国、英国和香港的一些人，给了上百万美元和数千万港币。这笔钱中的一部分，被用于破坏戒严活动，每一个参加设路障、堵军车的人，每天都可以得到30元的报酬。同时，他们还许下高价，收买暴徒，去烧军车和打解放军，许诺烧一辆军车给3000元，抓住或打死一个军人也给几千元。台湾一位军政要员发起了“送爱心到天安门”的运动，带头捐款10万元台币。国民党一个中委发起募捐1亿元台币，设立所谓“支持大陆民主运动基金”。台湾艺术文化界一些人发起“血脉相连声援大陆民主运动”。北京“高自联”致函“台湾艺文界朋友”，说什么“在此关键时刻，得悉台湾艺文界挺身而出”，“给予我们急需的物资和精神支持，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所有这些说明，极少数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制造的动乱，绝不象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要政府做点让步就可以平息，或者只发布一个戒严令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是横下一条心，要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联合起来，同我们死战到底的。一切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只会使他们更加放肆地向我们发动进攻。时间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越大。

七、极少数人是怎样挑起反革命暴乱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担负着“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而且担负着“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义务，这是宪法第29条明文规定了的。部队进城维护社会治安，正是执行宪法赋予的任务。

5月20日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之后，尽管遇到重重阻拦，部队仍然按照既定计划，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到达一部分警戒部位。极少数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深知，如果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全部按计划到位，那么，他们正在从事的种种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他们的全部阴谋就将很快以失败而告终。于是，他们窥测时机，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动乱加剧，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6月1日，我公安机关收审了非法组织“工自联”的几个头头，他们就借机煽动一些人，包围和冲击了北京市公安局、市委、市政府机关和公安部。6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借用了10个月的武警部队的一辆吉普车，在返回原单位途中，由于车速过快，路面有水打滑，造成翻车事故，撞死了人，但没有一个是学生。这本来是一起交通事故，有关部门正在处理，而极少数人却有意把它同

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城的行动联系起来，大造谣言，说是戒严部队的开道车故意轧死学生，鼓动不明真相的人，要抢夺尸体，举行抬棺大游行。一时间，人心浮动，气氛紧张。经过这样的煽动和鼓噪，暴乱的火就被他们点了起来。

6月3日凌晨，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就有人有组织地煽动一些人在建国门、南河沿、西单、木樨地等路口阻拦大小车辆，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曹各庄附近12辆军车被拦。从燕京饭店门前经过的战士被强行搜身。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轮胎被扎穿，并被隔离墩围住。

拂晓前后，永定门桥头的军车被推翻。木樨地军车车胎被扎穿。朝阳门的400多名进城战士被歹徒用石块乱砸。六部口、横二条一带军车被拦截，战士被围困。

早上7时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钻进被围困的军车内，抢夺装有子弹的机枪。从建国门到东单，以及天桥附近，进城部队被零星隔断，遭到围攻、殴打。在建国门立交桥上，有些战士的衣服被扒光，有的战士被打得遍体鳞伤。

上午，虎坊桥一带的进城部队被冲，战士遭痛打，有的被打瞎了眼睛。一些被打伤的战士在送往医院途中遭拦截，急救车车胎被放气，伤员被绑架。虎坊路至陶然亭21辆军车被围，在战士转移弹药时，前往护卫的民警被打伤。

中午，被拦阻在府右街南口、正义路北口、宣武门、虎坊桥、木樨地、东四等路口的解放军战士，有的被打伤，有的钢盔、军帽、雨衣、水壶、挎包被抢。六部口一伙人截了一辆载有枪支弹药的军车，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多次解围均未成功。车上的枪支弹药如被抢走或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护首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警部队施放了催泪弹，驱散了人群，抢回了弹药车。

在拦截、砸抢军车的同时，一伙暴徒围堵和冲击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他们冲人民大会堂、冲中宣部、冲广播电视部，冲中南海的西门和南门。保卫这些机关的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数十人负伤。

随着事态的急剧恶化，暴乱的挑动者更加猖狂。下午5时许，非法组织“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在天安门广场分发了菜刀、匕首、铁棍、铁链子和带尖的竹竿，声言“抓住军警就要往死里打”。“工自联”大广播中大肆叫嚣，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还有一伙暴徒纠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的围墙，抢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钢筋、砖块等，准备打巷战。他们的广播站不断播放如何制造和使用燃烧瓶、如何堵烧军车之类的“知识”，进行教唆和挑动。他们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砸、抢、烧，造成一个群众暴动的态势，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

正是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

八、反革命暴徒是怎样残害解放军的

自戒严以来，陆续进城的戒严部队根据中央的指示，始终保持高度克制的态度，尽量避

免发生冲突。6月3日暴乱发生后，在部队进城前，为了避免伤害群众，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于晚6时半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这个《通告》，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各种广播器，进行了反复广播。

6月3日晚10时前后，奉命向城内开进的各路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市区。但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严重阻拦。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仍然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而反革命暴徒怀着对解放军的刻骨仇恨，却利用这种克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打、砸、抢、烧、杀。

22点至23点，从翠微路、公主坟、木樨地到西单一线，有12辆军车被烧。有些人用卡车运来砖头，向战士猛砸。一些暴徒把无轨电车推到路口，放火焚烧，阻断了道路。有的消防车赶去灭火，也被砸烂、烧毁。

23点前后，虎坊桥3辆军车被砸，1辆吉普车被推翻。安定门立交桥军车被围堵。崇文门大街一个团的战士被围堵。建国门立交桥30辆军车被围堵。北京煤炭工业学校以西300多辆军车被围堵。为保证军车前进，有的战士和指挥员下车做疏导工作，被围攻殴打，有些被强行绑架，不知去向。被打伤的，有尉官、校官和将军。在南苑三营门受阻的军车，为避免冲突，往东绕行，至天坛南门再次被堵，许多军车被砸、被烧。珠市口一辆军车被堵后，一帮人爬到车上，下边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劝他们下来，当即被痛打，生死不明。

6月4日凌晨以后，焚烧军车的暴行愈演愈烈。在天坛东侧路、天坛北门、前门地铁西口、前门东路、府右街、六部口、西单、复兴门、南礼士路、木樨地、莲花池、车公庄、东华门、东直门，以及朝阳区的大北窑、呼家楼、北豆各庄，大兴县旧宫乡等地，数十个路口的数百辆军车，被暴徒用汽油、燃烧瓶和土制喷火器引燃，火光冲天，有的战士在车内被活活烧死，有的跳下车后被活活打死。有的地方，几辆、十几辆，甚至二三十辆军车同时被烧，一片火海。在双井路口，有70余辆装甲车被围，其中20余辆车上的机枪被暴徒拆掉。京原路口至老山骨灰堂以西，30多辆军车被暴徒付之一炬，现场浓烟冲天。有的暴徒手持铁棍，推着汽油桶，在路口堵截，见车就烧。多辆部队运粮车、被服车被暴徒抢劫，不知去向。有几名暴徒在复兴门立交桥一带，开着抢来的装甲车，边行进边开枪。非法组织“工自联”还在广播上宣称，他们缴获了一部军用电台和密码本。

在砸毁、焚烧军车的同时，一些暴徒对民用设施和公共建筑物发动了攻击。西城区的燕山等商店的橱窗被砸。天安门前和毛主席纪念堂西侧的松树墙被点燃。一些公共电汽车、消防车、救护车、出租汽车被砸毁和烧毁。特别恶毒的是，一伙人驾驶一辆装满汽油的公共汽车驶向天安门城楼，企图放火烧毁城楼，在金水桥南被戒严部队及时截获。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暴徒们不仅疯狂攻击军车，大搞打砸抢烧。而且，对解放军战士发动了灭绝人性的残杀，手段极其凶暴野蛮。

6月4日凌晨，东单路口一伙暴徒用酒瓶、砖头、自行车砸砍战士，许多战士血流满面。复兴门一辆军车被截，车上的某部管理科长、管理员、炊事员等12人被拉下车来，强行搜身，然后痛打，多人受重伤。六部口4名战士被围攻殴打，有的当场死亡。广渠门附近3名战士被痛打，只有一名被群众救出，两名下落不明。在西城区西兴盛胡同，有20余名武警战士被一伙歹徒毒打，有的被打成重伤，有的下落不明。护国寺一辆军车被截，战士被拉

下来痛打后当作人质，一批冲锋枪被抢走。一辆装满砖头的汽车，由东交民巷开往天安门广场，车上的人高喊：“是中国人的上来，砸解放军去。”

拂晓之后，残害解放军战士的暴行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武警一支队的一辆救护车，拉了 8 名受伤的战士送往附近医院时，被一伙暴徒拦住，当场就打死一名，还叫嚷要把其余的 7 名一齐打死。在前门大街的一家自行车店门前，有 3 名解放军战士被打成重伤，暴徒们围住狂叫：“谁敢救他们就打死谁。”在长安街上，一辆军车熄火，一二百名暴徒一拥而上，猛砸驾驶室，将司机活活砸死。西单十字路口以东 30 米处，一名战士被打死，又在尸体上浇汽油焚烧。在阜成门，一名战士被暴徒残害后，尸体被悬挂在立交桥的栏杆上。在崇文门，一名战士被一伙暴徒从过街天桥上扔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暴徒们狂叫，这是“点天灯”。在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附近，一名解放军军官被暴徒打死后，剖腹挖眼，把尸体挂在一辆正在燃烧的公共汽车上。

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等车辆达 1280 多辆，其中军用汽车 1000 多辆，装甲车 60 多辆，警车 30 多辆，公共电汽车 120 多辆，其它机动车 70 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 6000 多人，死亡数十人。他们为保卫祖国，保卫宪法，保卫人民，付出了鲜血甚至宝贵的生命。对他们的功绩，人民将永远铭记。

如此惨重的代价，最有力地说明了戒严部队所采取的极大的容忍和克制态度。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这支军队对敌人狠，对人民和，历来如此，他们在战争年代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党 800 万军队，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能够有效地保卫我们国家的神圣领土、领海和领空，为什么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却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呢？为什么他们手中有武器，反而挨了打，甚至被打死呢？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是因为好人和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这也正说明了人民解放军是热爱人民的，是不愿意误伤群众的。他们忍辱负重，从容赴死，正是人民军队本质的充分体现。否则，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和损失呢？这不正说明我们的军队为了保护人民而不惜牺牲自己吗？而最终为了平息反革命暴乱，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已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于围观的人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有的被流弹误伤，有的被持枪歹徒击伤击毙。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暴乱中有 3000 多名非军人受伤，200 余人死亡，包括 36 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人员等。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执行任务中受伤害的人员，政府要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

由于“美国之音”造谣和一些人有意传谣，社会上一度盛传，戒严部队进城之后，“血洗天安门广场”，“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倒在血泊之中”。真实情况是，戒严部队进入广场之后，凌晨 1 时半，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该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这个紧急通告用高音喇叭，进行了反复播放，时间长达 3 个多钟头。这时，停留在广场上静坐的青年学生集中在广场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3 时左右，他们经过内部磋商，派出代表向戒严部队表示，愿意自动撤出广场，戒严部队当即表示同意。凌晨 4 时半，广场上广播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同时，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正常秩序的通告。停留在广场上的

数千名青年学生听到通告后，打着各自的旗子和横幅等，两边布置了手拉手的纠察队，于5时左右离开广场。为了保证学生们安全撤离，戒严部队在广场东侧南口开出了一条宽阔的通道，保证学生顺利、平安地离开。这时，还有一些坚持不走的学生，戒严部队按照“通告”要求，强制他们离开了广场。到5时半，清场任务全部完成。广场静坐的学生，包括最后被强制离开的，没有死一个人。有人造谣说，广场“血流成河”，自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完全是胡说八道。

以天安门广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严部队全部到位为标志，首都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人民群众救护伤员、解救被围困的战士、积极配合和支持戒严部队，涌现出许多动人心弦的好人好事。由于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北京市的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他方面的损失更难以用金钱来计算。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正在为挽回遭受的损失，进行艰苦的劳动。现在，首都各项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全国局势也较快地趋于平稳，这反映了中央的正确决策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但是，动乱和暴乱尚未彻底平息，极少数反革命暴乱分子不甘心灭亡，仍在进行种种破坏活动，甚至梦想卷土重来。

为了取得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彻底胜利，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要彻底揭露动乱和暴乱的阴谋，依法惩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即那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以及制造打、砸、抢、烧、杀等种种暴行的刑事犯罪分子。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通过坚决果断、艰苦细致的工作，集中打击极少数首恶分子和拒不悔改的顽固分子，尽力扩大教育面和团结面。在此基础上，依靠广大群众，努力增产，厉行节约，艰苦奋斗，尽快把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造成的损失全部夺回来。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和委员：

我国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义斗争，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西欧某些国家，歪曲事实真相，进行造谣中伤，甚至对我实行种种的所谓谴责和制裁，掀起反华浪潮，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对此，我们深表遗憾。对于一切外来压力，我国政府和人民过去没有屈服过，现在不会屈服，永远也不会屈服。谣言必将破产，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我国将毫不动摇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我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发展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1989年6月30日

陈希同简历

陈希同，生于1930年6月，四川安岳人，1949年12月入党，1948年10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中文系肄业。1948—49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并参加“中国民主青年同盟”。1949—53年，任北京市西单区街道工作组组员，市公安局内二分局十二派出所副所长，内二分局人事股副股长、文书股股长、秘书。1953—63年，在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工作，任刘仁同志秘书，北京第一机床厂车间党支部副书记。1963—66年，任北京市昌平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县委副书记。1966—71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下放劳动。1971—73年，任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公社（农场）革委会副主任、马池口公社党委书记。1973—79年，任北京市昌平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1979—81年，任北京市副市长。1981—83年，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常务）、副市长。1983—88年，任北京市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市长。1988年起，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国务委员。1992年10月，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1995年4月，他因王宝森自杀而引咎辞职。1995年9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做出决定，将他清除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保留党籍以观后效。1997年8月29日，中纪委决定并报中央批准，开除陈希同党籍。1998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贪污和玩忽职守罪，决定将陈希同依法逮捕。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13年；以玩忽职守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4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赃物没收上缴国库。